

## 貢品與時尚：明代川扇考論\*

劉紫依\*\*

摺扇的普及，是明代社會風尚異於前代的物質表徵之一。晚明最盛行的二種摺扇中，蘇州摺扇以書畫扇面與精製扇骨著稱，四川摺扇則以進貢聞名，明人常簡稱之為「川扇」、「蜀扇」等，川扇廣義上亦包括各地的仿製品。過往對中國摺扇的研究，多側重扇面書畫藝術與江南製扇工藝，對明代社會生活與物質文化的討論，則一般認為明代宮廷品味的時尚影響、文化底蘊相對不高，川扇不重書畫，又與明代宮廷關係密切，其興衰歷史、風格特點、文化內涵皆未得到充分探討。本文將考證川扇的興衰歷史，並梳理文獻、圖像中川扇的特徵，與明墓屢見出土的無書畫金面摺扇實物比對，指出後者應屬川式扇，並辨析川扇與日本、蘇州、杭州、榮昌等地摺扇的關係，思考不以書畫著稱的川扇在中國摺扇史中的地位，也探究川扇作為方物、貢品、賜物、禮物、商品等在明代的社會文化內涵。川扇大致發端於明初，此後進貢宮廷並成為時尚，作為明代高檔無書畫摺扇的代表，是蘇州書畫扇以外，明代摺扇發展的另一重要線索，體現了明代摺扇文化的豐富性，還對杭州摺扇影響深遠；川扇到晚明已與國計民生、世風人情有深密的交織，後隨明亡而衰落，是明代物質文化中極富時代特色的內容。

關鍵詞：明代、川扇、摺扇、土貢、明墓

---

\* 本文的寫作承馮賢亮老師的指導，並蒙本刊二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的指正與建議，以及上海博物館、江西省博物館、四川樂山大佛博物館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Email: chaiyi1221@126.com。

## 引言

摺扇在明代取代傳統的團扇、羽扇等扇式而普及，<sup>1</sup>可謂有明社會風尚異於前代的物質表徵之一。晚明最為流行的是蘇州摺扇（時稱「蘇扇」、「吳扇」等）與四川摺扇（時稱「川扇」、「蜀扇」等）。<sup>2</sup>大體而言，蘇扇扇面「泥金最宜書畫」、<sup>3</sup>精製扇骨又有「懷袖雅物」之譽，<sup>4</sup>是當時蘇州作為一大時尚中心引領的諸種潮流之一；<sup>5</sup>川扇則以進貢宮廷著名，其中蜀王府所製最「精工」，<sup>6</sup>當時徽州、杭州等地所仿製者，也稱「蜀府」扇，<sup>7</sup>可視為廣義的川式扇。

迄今對摺扇的研究，在討論其起源與傳播之外，對明代以來中國摺扇的發展，多側重扇面書畫與江南扇藝，故較為關注蘇扇；<sup>8</sup>而僅附帶提到川扇的進貢與精美；<sup>9</sup>少數對川扇的專門討論，對其興衰歷史、風格特點、與他處摺

<sup>1</sup> 摺扇傳入中國並普及的過程，見呂晶森，〈十～十六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扇の流通と伝播〉，收入中島樂章、伊藤幸司編，《寧波と博多》（東京：汲古書院，2013），頁 135-168。

<sup>2</sup> 本文所謂「蘇扇」、「川扇」遵循明人習慣，一般是對兩地生產的摺扇之簡稱，廣義上包括他地仿製品（本文也統稱川扇及其仿製品為「川式扇」），但不涉及摺扇以外之扇。

<sup>3</sup>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2001），卷 12，〈物部四〉，頁 241。

<sup>4</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26，〈玩具·摺扇〉，頁 663。

<sup>5</sup> 對明清蘇州引領時尚的綜合考察，見范金民，〈「蘇樣」、「蘇意」：明清蘇州領潮流〉，《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4（2013），頁 123-141、160。

<sup>6</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6，〈玩具·四川貢扇〉，頁 662。

<sup>7</sup>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合肥：黃山書社，2018），卷 8，〈器用類·宮扇類〉，頁 388-389、414。

<sup>8</sup> 如李俊傑，〈摺扇及其扇面藝術〉，《上海博物館集刊》，4（1987），頁 101-110；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圖書，1992），第 4 章，〈中國的摺扇〉，頁 90-171；石守謙，〈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流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9（2010），頁 1-66、269；楊祥民，〈扇子的故事：傳統造物的禮儀性與審美性蠱測〉（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博士論文，2011），頁 103-108、117-119、133-139；許文美，〈明清摺扇藝術的發展〉，收入許文美主編，《惠風和暢：摺扇集萃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140-155。

<sup>9</sup> 如潘群，〈明代的摺扇〉，《文物》，7（1979），頁 88；王守稼，〈漫話摺扇與中日文化交流〉，《文物》，7（1982），頁 88；李俊傑，〈摺扇及其扇面藝術〉，頁 102；王頊，〈摺迭扇的輸入與仿製〉，《東南文化》，9（2001），頁 63、67。

扇的關係等，也仍多未釐清。<sup>10</sup>川扇的實物遺存也長期未獲辨認（圖1）。明中後期墓葬常出土不帶書畫的金面摺扇，扇面多有幾何紋飾，傳世鮮見，國內外學人或曰日本扇，<sup>11</sup>或曰蘇扇，<sup>12</sup>吳雪杉則將這類摺扇統稱為「金扇」，反駁了前兩種假設，轉而認「金扇」為明器。<sup>13</sup>只有少數學者考慮到川扇，沈從文的研究較早，但缺少論證且表述不盡準確；<sup>14</sup>近年劉芝華提出明墓無書畫摺扇中的「金地扇」、「黑地扇」分別屬於吳扇、川扇，此說仍值得商榷。<sup>15</sup>

此外，一些對明代財政、宗藩、軍事、文學等的研究，觸及了川扇的部分面向，<sup>16</sup>但對川扇的社會文化意涵，亦尚未有更綜合的考察。過往對明代社

<sup>10</sup> 見戴德源，〈川扇史話〉，《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82），頁90-93；金馬，〈四川扇子與朝鮮摺扇〉，《文史雜誌》，1（1998），頁19-20；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136、139-141。此外，《清史稿·藝文志·譜錄類》中著錄〔清〕謝鳴篁撰《川扇記》一卷，見趙爾巽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4355。該書今未見，似已佚。

<sup>11</sup> 見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高昕丹、陳恒譯，《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59；石守謙，〈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流行〉，頁24。

<sup>12</sup> 見何繼英，〈上海明墓出土摺扇〉，《上海文博論叢》，1（2003），頁37；鄭麗虹，〈明代中晚期「蘇式」工藝美術研究〉（蘇州：蘇州大學設計藝術學博士論文，2008），頁133-134；劉明杉，〈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中日交流史中的摺疊紙扇〉，《南方文物》，4（2017），頁172-173。夏寒，〈試論江南明墓出土摺扇〉，《中原文物》，2（2008），頁80則認為這類扇反映了晚明江南風尚而未下明確判斷。

<sup>13</sup> 吳雪杉，〈金扇：明代墓葬與中日交流〉，《文藝研究》，12（2019），頁135-146。

<sup>14</sup> 沈從文，《扇子史話》（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5），頁6、12。

<sup>15</sup> 劉芝華，〈非書畫吳扇的源起及性別建構——基於明代墓葬出土非書畫摺扇的分析〉，收入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第14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2），頁499-524。該文關於蘇州摺扇的一些說法也有討論的空間，容另文探討。

<sup>16</sup> 例如南炳文、湯綱將蜀扇加造視為神宗「揮霍浪費」，張仁璽、馮昌琳評之為「土貢的違制現象」；宋立傑提到了蜀王的詠扇、進扇、贈扇；陳旭介紹了萬曆間四川布政使程正誼因貢扇粗糙致仕之事；白維國指出《金瓶梅》中川扇乃晚明時尚，劉銘據《水滸傳》中川扇討論其成書年代。見南炳文、湯綱，《明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712-713；張仁璽、馮昌琳，〈明代土貢考略〉，《學術論壇》，3（2003），頁100；宋立傑，〈明代蜀王角色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5），頁33、51-52；陳旭，〈「化龍」遇「臥龍」：程正誼與明萬曆朝的平播戰爭〉，《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017），頁159-166；白維國，〈《金瓶梅》與摺疊扇〉，《中國文化研究》，4（1997），頁115-117；劉銘，〈從林沖的「摺疊紙西川扇子」看《水滸傳》的成書年代〉，《明清小說研究》，4（2009），頁140-147。

會生活、物質文化的研究，<sup>17</sup>常對明代尤其晚明宮廷品味的影響及底蘊評價不高，如巫仁恕認為：「明朝皇帝對流行時尚的影響非常有限，明代只有少數流行的東西，如馬尾裙與摺扇是和宮廷有關。」<sup>18</sup>卜正民（Timothy Brook）認為在明代「品位與金錢並重的經濟體系中」，「雅客」士大夫要比「豪客」皇帝更勝一籌。<sup>19</sup>石守謙則強調，在明代摺扇雖受宮廷青睞，但真正賦予它「文化上的角色意義」的仍是江南文士，尤其是其扇面山水創作：「摺扇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當以山水畫與它的結合最值得注意」。<sup>20</sup>若注意到川扇與明代宮廷（包括皇宮與蜀王府）<sup>21</sup>關係密切，且作為與蘇扇風格迥異的無書畫摺扇，同樣在晚明盛行並受到品評與書寫，或可豐富我們對明代摺扇的文化內涵以及其中宮廷的影響的思考。

因此，本文將嘗試綜合各類史料，重新梳理川扇生產、進貢、鼎盛、衰落、停貢的歷史，比較明墓「金扇」實物與文獻、圖像中的川扇，說明「金扇」應屬川式扇，並辨析川扇與日本、蘇州、杭州、榮昌等地摺扇的關係，思考不以書畫著稱的川扇在中國摺扇發展史中的地位，也探究川扇作為方物、貢品、賜物、禮物、商品等在明代尤其晚明的社會文化內涵。<sup>22</sup>

<sup>17</sup> 見常建華，〈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史學集刊》，3（2014），頁 95-110。

<sup>18</sup>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頁 311。

<sup>19</sup>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潘瑋琳譯，《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 183、185。此外喬迅（Jonathan Hay）討論了明清時期城市、文人、宮廷三種「品位體系」，認為晚明起主導作用的是城市品位，宮廷反受其影響，見喬迅著，劉芝華、方慧譯，《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頁 25-43。各人偏重雖有不同，但在認為明代宮廷時尚影響力有限這一點上基本一致。

<sup>20</sup> 石守謙，〈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流行〉，頁 2、20-21。

<sup>21</sup> 本文採用柯律格的「更廣泛意義上的宮廷」概念，包括兩京皇宮和諸藩王府，見柯律格著，黃曉鵬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頁 6。

<sup>22</sup> 基於明代社會變遷與川扇的興衰，本文中「晚明」基本對應嘉靖朝（1522-1566）至崇禎朝（1628-1644）。「晚明」之概念辨析可參考劉曉東，〈「晚明」與晚明史研究〉，《學術研究》，7（2014），頁 98-103、160。

## 一、貢扇興衰

### (一) 晚明人論川扇源流

晚明人談到摺扇，常說蘇州與四川兩處所製最佳，亦最流行。謝肇淛(1567-1624)說當時摺扇「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扇最盛行」；<sup>23</sup>文震亨(1585-1645)品評摺扇，「川中蜀府製以進御」、「姑蘇最重書畫扇」俱為重點；<sup>24</sup>方以智(1611-1671)列舉當朝「精于古」之器用，扇亦為「宮川扇、蘇金扇」二種。<sup>25</sup>

但川扇充貢並風靡的過程，當時已不盡為人所知。萬曆(1573-1620)中王家屏(1535-1603)目睹川扇巨額入貢，不禁發問：「不知其式樣之定、數目之增，起於何時，而至今遂遵以為額貢，歲歲為蜀累也？」<sup>26</sup>

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四川貢扇」條對川扇略作品評後，提到其進貢、賞賜情況：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豔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初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為例。按蜀貢初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為定額，責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為宋屬階，況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又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為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若

<sup>23</sup>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12，〈物部四〉，頁241。

<sup>24</sup> [明]文震亨原著，陳植校注，《長物志校注》(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卷7，〈器具·扇、扇墜〉，頁291。

<sup>25</sup> [明]方以智，《通雅》(合肥：黃山書社，2018)，卷33，〈器用·古器〉，頁522。

<sup>26</sup> [明]王家屏，〈答維涇坡撫臺(蜀扇)〉，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93，頁4249。

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sup>27</sup>

其說本於官方。萬曆重修《大明會典》載歲進川扇之制：

四川布政司造，撫臣奏進，歲例扇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把。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扇二千一百把。四十三年，又造小式細巧扇八百把。共一萬四千四百四十把。初起鎮守中官，後以為常。又蜀王府別有奏進。<sup>28</sup>

並規定：「凡蜀王府進扇，回賜：銀三百兩、大紅金綵常服三襲。若係世子，改綵段四表裏，銀同。差來人賞鈔五百貫。」<sup>29</sup>又有端午節賜川扇之例：

凡端午節文武百官俱賜扇，并五綵壽絲縷。大臣及日講經筵官，或別賜牙邊扇并綵條艾虎等物。各以品級為等。嘉靖中，內閣輔臣，吏、禮二部尚書，及日講官講衍義官，又別賜川扇有差。<sup>30</sup>

不過，川扇的進貢始末、細節，以及萬曆朝《大明會典》頒行後的情況，仍值得追問。

在四川地方上，又另有一套說法。蜀地名士楊慎（1488-1559）認為唐人李德裕作品中的「桐花鳳畫扇」即為「川扇之始」，並猜測：「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為地，畫人物花鳥於上，此其遺製乎？」<sup>31</sup>蜀成王朱讓栩（1500-1547）也認可此說。<sup>32</sup>萬曆間仕蜀的何宇度拾掇地方掌故而成《益部談資》，云：

川扇不知起自何時，然李德裕有〈畫桐華鳳扇賦〉云：「未若繪茲禽於素扇，動涼風於羅薦。」則唐時此地已嘗製之矣。竹本蜀所富有，第不甚堅厚。紙則出嘉州、彭縣，輕細柔薄，惟可製扇。是其來已非一

<sup>27</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6，〈玩具·四川貢扇〉，頁662-663。標點有調整。下引此條不另注。又「聚骨扇」及下文「聚扇」、「骨扇」、「撒扇」等皆摺扇別稱，可參楊祥民，〈扇子的故事〉，頁23。

<sup>28</sup> [明]申時行等修，〔萬曆〕《大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113，〈禮部七十一·給賜四·歲進·川扇〉，頁600。〔明〕朱勤美，《王國典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5，〈進貢〉，頁416「各王府進貢舊例」亦有「蜀府進扇」。

<sup>29</sup> [明]申時行等修，〔萬曆〕《大明會典》，卷110，〈禮部六十八·給賜一·王府（回賜附）〉，頁591。

<sup>30</sup> [明]申時行等修，〔萬曆〕《大明會典》，卷110，〈禮部六十八·給賜一·在京官員人等·節令〉，頁590。

<sup>31</sup> [明]楊慎，《升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81，〈桐花鳳畫扇〉，頁822。

<sup>32</sup> [明]朱讓栩，《長春競辰稿》（成都：巴蜀書社，2018），卷5，〈桐花鳳扇〉，頁173。

日，欲不充貢得乎？<sup>33</sup>

將川扇追溯到唐代，頗可渲染其歷史文化底蘊，卻有意無意忽略了唐代中國尚無摺扇的事實。四川的自然資源與製扇傳統，<sup>34</sup>誠然為明代川扇脫穎而出作了鋪墊，然而，此說未能解釋四川為何在明代轉而以摺扇著名。

## （二）四川貢扇始末再考

據實錄記載，明代蜀王進貢摺扇早在四川設置鎮守中官之前，萬曆《大明會典》稱川扇之貢「初起鎮守中官」，或僅就蜀府以外而言。目前可見四川進貢摺扇的最早記錄是永樂三年（1405），明代首位蜀王朱椿（1371-1423）所貢端午節物中有「聚扇」。<sup>35</sup>摺扇宋元已由日本、朝鮮輸入，中國也有所仿製，但比起傳統的團扇、羽扇等，在民初還屬舶來奇品。永樂（1403-1424）朝日本進貢摺扇，<sup>36</sup>成祖以之賞賜宗親，<sup>37</sup>又於內府仿製，十年、十五年都有端午前後賜文武百官扇的記載，<sup>38</sup>此舉既籠絡人心，也表現出對摺扇的偏愛。端午贈扇乃舊俗，<sup>39</sup>蜀王特意進貢新君偏好的新式摺扇，政治嗅覺可謂靈敏，這些摺扇或即蜀府模仿日本摺扇製成。成祖表示滿意，特賜書答曰：「送至荔枝、艾

<sup>33</sup>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上，頁742。

<sup>34</sup> 明人提到的四川古代名扇除桐花鳳扇外，還有涪州扇、魏城綿扇等，見[明]曹學佺，《蜀中廣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68，頁139-140。

<sup>35</sup>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42，永樂三年五月壬戌條，頁680。

<sup>36</sup> 見呂晶淼，〈十～十六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扇の流通と伝播〉，頁135-148。

<sup>37</sup>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25，永樂元年十一月庚辰條，頁451：「賜書周王橚……並賜日本扇及椰子等物。」卷30，永樂二年四月甲午條，頁552：「賜周王橚紗五十匹，毳絲、將樂布各百匹，[日]本扇貳百握。」《明太宗實錄校勘記》，頁159。

<sup>38</sup> 見[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128，永樂十年五月甲申朔條，頁1591；卷189，永樂十五年閏五月丙寅條，頁2007。結合當時獲賜者的詩文，所賜當為內府所製摺扇，見許文美，〈明清摺扇藝術的發展〉，頁143。

<sup>39</sup>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35，〈書法〉，頁647、1802：「[貞觀]十八年（644）五月，太宗為飛白書，……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賜君飛白（白）扇二枚……』」。

虎、聚扇、香囊、綵花諸物，具見親厚之意。」<sup>40</sup>

朱椿獻扇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但貢扇大概隨後成為了蜀府傳統。弘治十七年（1504）題准，各王府「扇鮓之類，俱不必進」，<sup>41</sup>而正德四年（1509）「禮部奉旨檢詳累朝政令，凡涉王府者，條列上請」，其中一條令各王府「今後若進筍、進扇之類，宜令本府自備腳力，免驛遞應付，以蘇民困」，<sup>42</sup>王府貢扇當又恢復。

鎮守中官進扇不知始於何時。宣德（1426-1435）中各省遍設鎮守中官，<sup>43</sup>「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sup>44</sup>宣宗本就喜好摺扇，<sup>45</sup>也許宣德中四川鎮守中官已以摺扇為「孝順」。<sup>46</sup>初撰於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初重校刊行的《大明會典》「歲進」中仍無川扇，<sup>47</sup>但正德間川扇採辦應已頗繁。據說當時四川參議張宦「下岳池縣製造川扇，民苦於賠償」。<sup>48</sup>六年，因「蜀盜克斥，軍興費用不貲，民苦科徵」，在四川巡按御史俞緇請求下，「近奉駕帖採辦禽鳥、大木、密（蜜）煎、川扇之類」方得暫免。<sup>49</sup>十六年，佞倖錢寧

<sup>40</sup> [明] 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 42，永樂三年五月壬戌條，頁 680。朱棣與朱椿的微妙關係，見宋立傑，〈微妙的平衡：論蜀獻王朱椿與明成祖的關係〉，《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6（2016），頁 105-111。

<sup>41</sup> [明] 申時行等修，〔萬曆〕《大明會典》，卷 56，〈禮部十四·王國禮二·慶祝（表箋進貢附）·進貢〉，頁 352。

<sup>42</sup> [明] 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58，正德四年十二月庚戌條，頁 1298。

<sup>43</sup> 見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269。

<sup>44</sup> [明] 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頁 3。

<sup>45</sup> 見許文美，〈明清摺扇藝術的發展〉，頁 144。

<sup>46</sup> 目前尚未見到宣德年間四川進扇的直接記載，但當時寧王朱權也「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見 [明] 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45，宣德三年七月丁卯條，頁 1106），進扇應頗投時主所好。

<sup>47</sup> [明] 徐溥等奉敕撰，〔明〕李東陽等重修，〔正德〕《大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02，〈禮部六十一·歲進〉，頁 934-936。

<sup>48</sup> [明] 李濂，《嵩渚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 85，〈太原府知府張公傳〉，頁 292。

<sup>49</sup> [明] 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 72，正德六年二月乙酉條，頁 1581-1582；《明武宗實錄校勘記》，頁 278。

被抄沒家產中已有「川扇五十櫃」。<sup>50</sup>

嘉靖十年（1531）似為川扇進貢制度化的關鍵年份。是年五月初三，「賜輔臣、日講等官川扇」首次見於實錄；<sup>51</sup>八月，革四川鎮守太監蕭通。<sup>52</sup>川扇被指定為「歲進」並由「四川布政司造，撫臣奏進」或即在此前後。此後以川扇賞賜貴近之臣也沿以為例，與川扇的歲進相應。

明代上供採造大約「至世宗、神宗而極」，<sup>53</sup>嘉靖以降，貢扇亦至萬曆朝而極。從現存記錄（附表一）來看，嘉靖中布政司原年例為 11540 把，三十年（1551）加造備用扇 2100 把，但四十三年（1564）三月只有進原額年例扇的記載，或許加造未遽沿以為例。然而萬曆重修《會典》稱共 14440 把，卻已是將原年例與嘉靖三十年加造 2100 把、四十三年加造 800 把合計而得。萬曆中添造往往著為年例，貢額累加，蓋成常態，七年（1579）、二十三年（1595）等明確記錄之外，據說二十七年（1599）又一次「欽降新式加造」，<sup>54</sup>次年貢數已高達「四萬九千餘柄」，<sup>55</sup>三十四年（1606）四川巡按孔貞一上言稱「歲進金扇四萬八千四百餘柄」，「近且歲有加添」，<sup>56</sup>遠超《會典》額度。又據說三十三至四十年間（1605-1612）蜀撫喬璧星「每歲裁去三千柄」，<sup>57</sup>終究是杯水車薪。

<sup>50</sup> [明]孫繼芳，《磯園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頁 548。

<sup>51</sup>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25，嘉靖十年五月丙戌條，頁 2987。此前川扇雖已獲皇家青睞，但鮮有御賜的記錄，僅見正德朝太監劉瑾贈翰林川扇，見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70，〈列傳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一·何瑋〉，頁 7256。

<sup>52</sup>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卷 129，嘉靖十年八月丁酉條，頁 3068。

<sup>53</sup>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 82，〈食貨六·上供採造〉，頁 1989。

<sup>54</sup> [明]韓敬，〈大京兆程公居左先生傳〉，收入 [明]程正誼著，程朱昌、程育全編，《程正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284。

<sup>55</sup> [明]李化龍，《平播全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 4，〈乞宥程布政等疏〉，頁 216。

<sup>56</sup>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421，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丁酉條，頁 7976。

<sup>57</sup> [明]姚希孟，《棘門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3，〈中議大夫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聚垣喬公墓誌銘〉，頁 664；[明]吳之線、[明]杜應芳纂修，[萬曆四十七年]《四川總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卷 3，〈省志三·秩官·都御史表〉，頁 46。筆者案：為避免與萬曆九年《四川總志》混淆，筆者腳註宜保留「四十七年」等字，以示區別；以下皆從之。

至於蜀王府，現存進扇記錄並非每年，且數額千、百不定，回賜也常不按《會典》之例。布政司與蜀王府在進貢之外還將大批川扇作饋贈等用，故川扇實際年產量又遠超貢額，謝肇淛推測：「蜀扇每歲進御、饋遺不下百餘萬」。<sup>58</sup>

歲進川扇有欽定樣式，今可見萬曆二十三年的添造之旨：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著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群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閒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桃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sup>59</sup>

「目擊扇事」的蜀撫李化龍(1554-1611)敘述了四川布政司萬曆二十八年(1600)分貢扇從原料採購、製造到解進的概況：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支發錢糧，買辦物料，責委專官管理」，「次年鳩集工匠，做造一年，至十一月內方完，十二月內解進」，大致十一月末、十二月初「裝箱起解」。<sup>60</sup>時任左布政使程正誼(1534-1612)提到製扇需「赤金數百兩」，「發銀所屬州縣分投市買」，主要從雲南採購。<sup>61</sup>布政使本人按例應在製扇期間「親到扇局，時刻稽查」，<sup>62</sup>當

<sup>58</sup> [明] 謝肇淛，《五雜俎》，卷 12，〈物部四〉，頁 241。

<sup>59</sup> [明] 談遷著，羅仲輝、胡明校點校，《叢林雜俎·智集·逸典·川扇》(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61-62。

<sup>60</sup> [明] 李化龍，《平播全書》，卷 4，〈乞宥程布政等疏〉，頁 216、217。

<sup>61</sup> [明] 程正誼，《程正誼集》，卷 8，〈四川徵採始議〉，頁 218。

<sup>62</sup> [明] 程正誼，《程正誼集》，卷 6，〈陳情引罪懇宥察官疏〉，頁 178。

年「播事方殷」，程正誼事務繁忙，催督製扇之事委託布政司理問趙嘉賓、成都府經歷鄭汝清代理。<sup>63</sup>布政司與蜀府貢扇到達京師大致在二、三月份（附表一）。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司法檔案中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成都府灌縣「奉布政司明文發銀收買造扇青竹」<sup>64</sup>的記載，所買當為二十九年（1550）分貢扇物料；又萬曆九年《四川總志》錄當時四川按察使胡定〈貢扇〉詩云：「正月發巴川」。<sup>65</sup>相比之下，李化龍撫蜀時布政司貢扇的物料採買與製成起解時間都有所提前，側面透露出萬曆中貢扇任務日益繁劇。

天啟（1621-1627）時川扇的歲進被打亂。西南爆發「奢安之亂」，川省「兵餉急缺」且「民苦匠逃，造辦甚難」，二年、四年分貢扇皆免，留充軍餉；<sup>66</sup>五年仍免貢扇，本計劃「明歲止進二萬，待地方事平，照舊解進」，<sup>67</sup>但六年又因營建皇極、中極、建極三殿，「命四川進年例扇柄以後折價解助大工，俟工完，仍舊進扇」。<sup>68</sup>崇禎三年（1630），為修築德陵，「帝命川省四年分貢扇仍折價助工」。<sup>69</sup>十五年，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下，「免四川貢扇三年」。<sup>70</sup>

三年未滿，燕京已然易主，四川則為張獻忠所盤踞。南明弘光元年（1645），

<sup>63</sup> [明] 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 347，萬曆二十八年五月癸卯朔條，頁 6467；卷 350，萬曆二十八年八月辛未朔條，頁 6553-6554；[明] 李化龍，《平播全書》，卷 4，〈乞宥程布政等疏〉，頁 216-217。

<sup>64</sup> [明] 佚名輯，《四川地方司法檔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299-300。

<sup>65</sup> [明] 虞懷忠、[明] 郭棐纂修，[萬曆九年]《四川總志》（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33，頁 169。筆者案：為避免與萬曆四十七年《四川總志》混淆，筆者腳註宜保留「九年」等字，以示區別；以下皆從之。

<sup>66</sup> [明] 汪應蛟，《計部奏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3，〈賊勢復張岩城疊陷蜀事萬分危急疏〉，頁 575；[明] 朱燮元，《少師朱襄毅公督蜀疏草》（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6，〈催餉辭銜免扇疏〉，頁 189。

<sup>67</sup> [明] 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57，天啟五年三月辛亥條，頁 2601。

<sup>68</sup> [明] 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卷 68，天啟六年二月壬寅條，頁 3274。

<sup>69</sup> [清] 汪楫輯，《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39，崇禎三年十月庚申條，頁 2362。

<sup>70</sup> [清] 不著撰人，《明實錄附錄·崇禎實錄》，卷 15，崇禎十五年四月庚子朔條，頁 428-429。

端午甫過，滿清豫王多鐸（1614-1649）率軍渡過長江，南京降臣「咸致禮幣」，目擊者稱錢謙益（1582-1664）的禮單前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啟上貢」，禮品包括「真金川扇十柄」，<sup>71</sup>這大概是川扇最後一次「上貢」。順治八年（1651）八月，清世祖諭戶部：

朕軫念百姓疾苦，凡事有不便於民者，悉令罷之。今四川進貢扇柄，湖廣進貢魚鮓，道經水陸，去京甚遠，夫馬船隻，動支錢糧，苦累小民，朕甚憫之，以後永免。著為令。<sup>72</sup>

事實上已停產、停貢多年的川扇，至此在新朝正式被「永免」。

## 二、形制風格

### （一）文獻、圖像記錄

被列入歲進而風行一時的川扇，與明代其他地區的摺扇相比究竟有何特色，在已知的明代摺扇遺存中又是否有川扇的蹤影，值得考察。下文先依傳世文獻、圖像對川扇的特點作一歸納。

方以智較集中地談到了明代川扇的材料、形制、性能與仿製情況：

摺疊扇貢於東夷，……取宮扇、川扇者，以其輕而易收，漆骨不汗，綿漆不畏風日也。蜀府用丹稜棉紙，有藤骨者。徽杭加全（金）加彩，金銀鉸，皆以蜀府裱色為地，故概名之曰「蜀府」。又有折團扇、折掌扇。凡辨舊川扇，以款、以紙，嘗嗅而知之，無紙漆氣，然偽者以紙封而煙熏之。<sup>73</sup>

參酌其他記錄，川扇及其仿製品的主要特徵有：

扇釘貴金、銀。嚴嵩（1480-1566）被籍沒家產中有「金鉸川扇」4340把、

<sup>71</sup>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頁27。

<sup>72</sup>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59，順治八年八月己巳條，頁471。

<sup>73</sup>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8，〈器用類·宮扇類〉，頁388-389、414。下引此條不另注。

「銀鉸川扇」10007把，此外「各色川扇」僅9057把。<sup>74</sup>文震亨說蜀府扇金鉸者最貴重。<sup>75</sup>前引萬曆二十三年添造之旨中川扇「俱金釘鉸」。徽杭扇之「金銀鉸」應也屬於模仿川扇之一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託名仇英的晚明《清明上河圖》卷所繪「宮川雅扇」店鋪中，扇釘特意點上金色（圖2）。

扇骨內胎多用竹。正如何宇度所言：「竹本蜀所富有。」<sup>76</sup>文震亨、方以智特別提到蜀府藤骨扇，當為少量奇品。<sup>77</sup>外層多上漆，有些有雕刻。陸深（1477-1544）形容為「漆箭爛斑，宛轉輻輪之輳」，<sup>78</sup>祝允明（1461-1527）提到黑漆、金漆，及「直骨」、「刻竹節文」之別。<sup>79</sup>前述《清明上河圖》「宮川雅扇」店中有紅、黑、綠各色漆骨。《金瓶梅》中「紅骨、細灑金、金釘鉸川扇兒」應即紅漆骨，<sup>80</sup>唯「細灑金」指扇面還是扇骨，並不明確，清人黃之雋（1668-1748）稱蜀府扇有「摻星細骨」，<sup>81</sup>則扇骨可能灑金。前引二十三年旨中「渾貼雕邊骨」則更華貴，「渾貼」也稱「渾金漆」、「貼金漆」等，<sup>82</sup>萬曆五年四月三十日賜諸臣扇，最高規格即「渾金雕邊骨」。<sup>83</sup>崇禎中張緒倫（1587-1642）獲賜「雕龍川扇」，<sup>84</sup>可能也是雕邊。「漆骨不汗」，非徒美觀而已。又有「畫骨

<sup>74</sup> 不著撰人，《天水冰山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183。

<sup>75</sup> [明]文震亨，《長物志校注》，卷7，〈器具·扇、扇墜〉，頁291。

<sup>76</sup>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上，頁742。

<sup>77</sup> [明]文震亨，《長物志校注》，卷7，〈器具·扇、扇墜〉，頁291。

<sup>78</sup> [明]陸深，《儼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8，〈謝賜川扇〉，頁176。

<sup>79</sup> [明]祝允明，《枝山文集》（天津：天津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元和祝氏刻本），卷4，〈又促金生許川扇不至（二首）〉，頁24b。

<sup>80</sup> [明]蘭陵笑笑生著，戴鴻森校點，《金瓶梅詞話（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頁88。白維國，〈《金瓶梅》與摺疊扇〉，頁116誤謂其「非指紅木、檀木扇骨，更非髹以紅漆……乃指竹骨經長期摩挲而形成的紅亮色澤。」

<sup>81</sup> [清]黃之雋，《唐堂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50，〈沁園春·咏蜀府扇〉，頁706。

<sup>82</sup> [明]黃成著，[明]揚明注；長北校勘、譯注、解說，《髹飾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93。

<sup>83</sup> 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萬曆五年四月三十日丁亥條，頁158。

<sup>84</sup> [清]張貞，《杞田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2，〈先叔父侍御府君行略〉，頁713。

川扇」，<sup>85</sup>似為扇骨上有畫。

扇面，何宇度稱用嘉定州與成都府彭縣之紙，「輕細柔薄」。<sup>86</sup>方以智稱蜀府扇用眉州丹棱縣棉紙，眉州亦毗鄰嘉定州，<sup>87</sup>「棉紙」也作「綿紙」，<sup>88</sup>文震亨說川扇最貴重者「面薄如輕綉」，<sup>89</sup>邢侗(1551-1612)也說川扇紙「薄如輕裕、綿如純繭」，宜於拓印法帖，<sup>90</sup>晚明贛拓亦用之。<sup>91</sup>川扇「輕而易收」，以開合方便著稱，<sup>92</sup>輕薄柔韌的綿紙面蓋為原因之一。

扇面多以柿漆(也稱「柿油」)染色。楊慎謂「櫛棗」又名「牛妳柿」、「梲」等，「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為之」。<sup>93</sup>有詩云：「渥紫梲膏鍊月顏。」<sup>94</sup>「梲膏」即指柿油。也有人用「紫雲」、「紫霞」、「多黔」<sup>95</sup>等語形容川扇扇面。方以智則說徽杭摺扇都以「蜀府梲色」為底色。「梲」即梲柿，「搗碎浸汁謂

<sup>85</sup> [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15，〈謝賜小暑節銀鉸畫骨川扇并十二香菇疏(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九日)〉，頁681-682。

<sup>86</sup>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上，頁742。

<sup>87</sup> 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冊7，《元、明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頁62-63；牛漢平編著，《明代政區沿革綜表》，頁250、265-266。

<sup>88</sup> 《天工開物·殺青》：「凡皮料堅固紙，其縱文扯斷如綿絲，故曰綿紙。」見[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242、249。

<sup>89</sup> [明]文震亨，《長物志校注》，卷7，〈器具·扇、扇墜〉，頁291。

<sup>90</sup> [明]邢侗，《來禽館集》，卷27，〈與王子廡中丞〉，收入[明]邢侗著，宮曉衛、修廣利點校，《邢侗集》(濟南：齊魯書社，2017)，頁659。

<sup>91</sup> [明]高濂著，王大淳點校，《遵生八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卷11，〈燕閑清賞箋上·論帖真偽紙墨辨正〉，頁564-565。

<sup>92</sup> [明]汪砢玉，《珊瑚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46，〈又題菊石便面〉，頁868；[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14，〈簞〉，頁418。

<sup>93</sup> [明]楊慎，《升菴集》，卷80，〈櫛棗〉，頁801。另見同卷〈君遷樹〉，頁804：「《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

<sup>94</sup> [明]楊慎，《升菴集》，卷31，〈謝同鄉諸公寄川扇二首〉，頁224。

<sup>95</sup> [明]顧鼎臣著，蔡斌點校，《顧鼎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謝賜川扇表(嘉靖十七年)〉，頁82；[明]姜埰著，印曉峰點校，《敬亭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4，〈寓宣州馬氏祠感舊追作〉，頁164；[明]陳璫，〈貞素翁傳(扇)〉，收入[明]陳邦俊輯，《廣諧史》(濟南：齊魯書社，1995)，卷6，頁375。

之柿漆，可以染罽、扇諸物。」<sup>96</sup>柿漆亦保護綿紙面，「不畏風日」。

扇面底色上的裝飾以彩畫與金飾為主。楊慎所謂「人物花鳥」、<sup>97</sup>沈德符所謂「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當與萬曆二十三年旨中各種「彩畫面」同類。萬曆五年四月三十日賜扇，規格從高到低有「全金鉸渾金雕邊骨綵畫扇」、「金鉸畫心川扇」、「金鉸灑金川扇」、「銀鉸灑金川扇」，<sup>98</sup>看來僅稱「灑金」者可能沒有圖畫，與「彩畫」、「畫心」者有別，《金瓶梅》中西門慶所拿灑金川扇或即此類。此外，蜀成王朱讓栩有不少題扇詩，意境似題扇面文人畫，<sup>99</sup>然而晚明文士又屢說川扇不宜書畫，<sup>100</sup>故總體而言，彩畫與金飾圖案可能比文人書畫更代表川扇的特色。方以智所謂「辨舊川扇以款」之「款」，當指款式而非款識。

另外，蜀王還貢過一種「箎扇」，數量似較少（附表一），疑即萬曆朝賞賜記錄中的「圓光箎扇」、「圓光扇」，<sup>101</sup>此種扇大概為圓型，或即方以智所謂川扇中的「折團扇」，沈德符也提到宮中「有以紙絹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sup>102</sup>

## （二）明墓出土實物

茲綜合文字描述、圖錄照片、展覽實物，將明墓出土無書畫的金面摺扇——即吳雪杉所謂「金扇」<sup>103</sup>——之信息匯於「附表二」，分列扇釘、扇骨、扇

<sup>96</sup>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8），頁1781。

<sup>97</sup> [明]楊慎，《升菴集》，卷81，〈桐花鳳畫扇〉，頁822。

<sup>98</sup> 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萬曆五年四月三十日丁亥條，頁158。

<sup>99</sup> 例如：「獨坐南山下，寂無車馬聲。襟懷淵水靜，身世野雲輕。盡是雲林氣，真忘蝸角名。清風出千古，此性本生成。」仿佛題林間高士圖，見[明]朱讓栩，《長春競辰稿》，卷3，〈題扇〉，頁124。又裴景福（1854-1924），《壯陶閣書畫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677著錄一楊慎書法扇面：「淡碧紙本，光澤如油，橫斜桃花一枝，左角書『媽媽』二字精妙，當亦蜀製。」

<sup>100</sup> [明]王經，〈清風先生傳（扇）〉，收入[明]陳邦俊輯，《廣諧史》，卷5，頁351；[明]方以智，《流寓草》（合肥：黃山書社，2018），卷9，〈秦淮漫興十首·其四〉，頁198。

<sup>101</sup> 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萬曆三年五月二日己亥條，頁101；萬曆五年四月三十日丁亥條，頁158。

<sup>102</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6，〈玩具·摺扇〉，頁663。

<sup>103</sup> 為行文簡便，下文暫採用吳雪杉的定義簡稱為「金扇」。

面特徵，並且結合筆者的上手經驗，將金扇實物與文獻、圖像中的川扇比對。

從「附表二」可見，目前出土金扇的明墓年代大致是正德到崇禎，正是川扇流行時期。製作方面，迄今發現的金扇扇釘多為金屬質，有的明確為金、銀、銅等，符合川扇扇釘材質。扇骨多為圓頭竹胎漆骨，其中最華侈者出自江西南城益宣王朱翊鉞與繼妃孫氏棺，通體塗金，大骨（也稱「主骨」、「邊骨」等）透雕龍、鳳圖案（圖3），工藝頗接近記載中高規格川扇的「渾貼雕邊骨」，題材亦與「雕龍川扇」相合；多數扇骨髹深色漆並灑金，無雕刻（圖4），且大骨、小骨皆纖細，誠所謂「漆箭爛斑」、「摻星細骨」；筆者還見到過灑金與雕邊的組合（圖5、6）。另有部分金扇下半部分扇骨較寬，展開後連成一片，上有泥金書法、彩繪圖案等，如上海朱守城墓（圖7、8）、廣東大埔黃辰墓所出，讓人想到「畫骨川扇」，又可能與徽杭「蜀府扇」在仿製川扇基礎上「加金加彩」有關。

扇面多為紙質，有直接記錄為綿紙者。上手可知頗為輕薄柔軟。多數以黑、棕等深色為地，上海諸純臣墓、江蘇江陰長涇明墓所出明確為柿漆面，江西彭澤陶埜墓出土者也據稱「黑漆油亮」。除了江陰出土之扇內襯剪紙較特殊外，大多在深色地上施以金、彩。朱翊鉞與孫氏之扇雙面彩畫雲龍、鳥獸，正是彩畫川扇的典型題材（圖3）；較次如李氏之扇，單面中心有彩畫，周圍配幾何紋（圖4），又如樂山出土者，一面灑金、貼金上墨繪人物紋，一面灑金、貼金幾何紋；最常見的則是無裝飾畫的純幾何紋扇（圖9、10）。扇面裝飾之差異，令人想起「彩畫」、「畫心」與應無畫的「灑金」川扇的差別。

金扇不僅與文獻、圖像中的川扇頗可相應，也與日本扇、蘇扇有諸多區別。首先，雖然被一些學者認為有日本風情，但也正如另一些研究已注意的，明墓金扇就扇骨、扇面特徵而言，當為中國本土所製。「附表二」中，扇骨基本為圓頭，為同時期日本扇所少有；<sup>104</sup>雙面扇面亦屬中國摺扇之特色，與日本傳統的單面摺扇有別；<sup>105</sup>至於裝飾，吳雪杉指出，11世紀以深色作底的日本扇就已輸入中國，且最晚12世紀日本扇已飾以菱形金箔，但「在12至17

<sup>104</sup> 夏寒，〈試論江南明墓出土摺扇〉，頁76注意到日本中世之摺扇多為「直根」。

<sup>105</sup> 中國的雙面貼紙摺扇後來反傳到日本，被稱為「唐扇」，見中村清兄，〈扇と扇繪〉（京都：河原書店，1969），頁180-181、195-199。

世紀之間，目前還沒有發現與明墓金扇所用菱形圖案完全一致的日本扇。」他認為金扇「可能始於模仿日本摺扇」而逐漸自具特色，但尚不能判定其「『原型』是否直接出自日本」。<sup>106</sup>考慮到明初首任蜀王已進貢摺扇，則四川最初製摺扇，也許尚多借鑒日本，川扇的風格誠有可能在吸收了黑地、菱形金箔等日本扇元素的基礎上發展而成，再加上傳世品罕見，以至於在今人眼中顯示出異域感。

其次，晚明蘇州摺扇以泥金書畫扇著稱，劉芝華因而判斷明墓出土的無書畫摺扇中，黑地扇為川扇及其仿製品，泥金地墨繪幾何紋扇則為蘇扇。<sup>107</sup>然而，正如吳雪杉所說：「無論貼金還是泥金，抽象的金色幾何形始終是金扇視覺上的中心」，無書畫金扇「在裝飾方式和價值趣味上」與泥金書畫扇迥異。<sup>108</sup>此外，金扇扇骨裝飾繁複，也不像晚明蘇扇以素雅整淨的竹骨為「懷袖雅物」。<sup>109</sup>晚明人對最盛行的「吳、蜀二種扇」的描述，指涉的不僅是產地的區別，還有風格的分野；<sup>110</sup>徽杭摺扇被「概名之曰『蜀府』」，也是因為風格接近蜀府扇。因此若認可金扇中的黑地扇為川扇，則就風格而言，與黑地扇一脈相承的無書畫泥金地扇也應歸入廣義的川式扇，而不應視為蘇扇；明墓出土的書畫扇與無書畫金扇兩大類，庶幾正對應著晚明蘇扇、川扇兩股潮流。

再者，金扇亦與明墓中的模型明器有顯著區別。<sup>111</sup>朱守城墓出土的一柄幾何紋扇被形容為「精巧輕便」，扇骨「細薄而勁挺」；筆者所上手的保存較好的金扇，亦皆開合方便、輕盈適用，符合明人對川扇使用體驗的記錄，並在細節中展現出實用性，例如圓頭扇骨握感舒適，又如扇面下沿內部增加夾

<sup>106</sup> 吳雪杉，〈金扇〉，頁 140-142、145。

<sup>107</sup> 劉芝華，〈非書畫吳扇的源起及性別建構〉，頁 501-504、511。

<sup>108</sup> 吳雪杉，〈金扇〉，頁 142。

<sup>109</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6，〈玩具·摺扇〉，頁 663；對蘇扇的評鑒另見 [明]張大復撰，李子綦點校，《梅花草堂筆談》（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卷 14，〈簞〉，頁 418-419。

<sup>110</sup>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 12，〈物部四〉，頁 241。

<sup>111</sup> 明墓明器的概貌，見夏寒，〈試論江南明墓出土之模型明器〉，《江漢考古》，2（2010），頁 95-102。

層(圖 11、12)，幫助抵禦開合的磨損。因此，這些金扇原本應供生者使用。<sup>112</sup> 明人有將生前寶愛的川扇隨葬的記載，如黃璉(1437-1502)季子黃講，「父遺之川扇一握，至老如新。遺命曰：『必以殉。』」<sup>113</sup> 益藩羅川王族墓「殮衣」清單中有「金扇一把」，實物未見，據吳雪杉推測可能與益宣王墓之扇同類，<sup>114</sup> 而明代亦有稱川扇為「金扇」的例子。<sup>115</sup> 此外清乾隆(1736-1795)時陸氏後裔仍收藏有陸深拜賜的龍紋金扇，觀者稱「當是川製」<sup>116</sup>，陸深墓亦出土龍紋金扇，很可能是陸深獲賜的川扇部分傳世、部分隨葬。<sup>117</sup>

綜上所述，明墓「金扇」總體上應屬於川式扇，而非日本扇、蘇扇或明器。由實物可更直觀地感受到，即便四川製作摺扇之初或許受到日本扇的一定影響，至少到晚明時期，川扇已自具特色：由金屬釘鉸固定的圓頭竹胎漆骨，上施雕刻、灑金或描金彩繪，雙面柿漆綿紙扇面，以灑金、貼金、泥金、彩繪等手法表現裝飾畫或幾何紋，以深色映襯，取得鮮明奪目的效果，異於蘇扇以簡潔的扇骨與泥金扇面來襯托書畫。石守謙認為：「中國文人摺扇上的金地水墨山水幾乎可以說是文人品味中講究『低調奢華』面向的代言物。」<sup>118</sup> 然則川扇可謂「高調奢華」；耀眼之餘，川扇也輕便、耐用。不過，川扇在明代的語境中，究竟如何被認識、使用與敘述，還需下文討論。

<sup>112</sup>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洞庭山發掘清理明許裕甫墓〉，《文物》，3(1977)，頁 79 稱吳縣許裕甫墓出土 1 柄「隨葬明器」扇，尚未見實物，待考。

<sup>113</sup> [明]何喬遠，《閩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111，〈英舊志(縉紳)·興化府(莆田縣七)〉，頁 11。

<sup>114</sup> 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154；吳雪杉，〈金扇〉，頁 136-137。

<sup>115</sup> 如《明神宗實錄》中作「金扇」，同日起居注作「川扇」；見[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 50，萬曆四年五月十六日戊申條，頁 1154；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頁 132；又如前引萬曆間四川巡按孔貞一言「歲進金扇」、崇禎間宋應星稱「川中金扇」，見[明]宋應星，《野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頁 22。不過明人所謂「金扇」不限於川扇，容另文再論。

<sup>116</sup> [清]阮葵生撰，李保民校點，《茶餘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19，頁 464。

<sup>117</sup> 陸深獲賜川扇，見[明]陸深，《儼山集》，卷 28，〈謝賜川扇〉，頁 175-176。

<sup>118</sup> 石守謙，〈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流行〉，頁 25。

### 三、社會文化意涵

#### (一)「川扇」、「宮扇」、「蜀府扇」

與今人觀感不同，在明人筆下，川扇很少與外國情調相連。蜀地精英通過對川扇的書寫，塑造著它的方物形象，除了前述對川扇材質、式樣的記述及對其歷史的建構，也有詩文吟詠。例如嘉靖初楊慎貶謫雲南，「同鄉諸公」給他寄去川扇，他的答詩將對川扇的描摹與各種蜀地典故糅合，透出濃濃鄉情：

對青筠膜漬霞斑，渥紫楞膏鍊月顏。(原注：楞，小柿也。)自覺金風爽  
仙馭，誰將玉雪灑人寰。薛濤歌裏揚清嘯，卓女吟邊障遠山。萬里橋  
西銷暑會，幾回瓊樹夢中攀。<sup>119</sup>

川扇也漸成外人對川蜀印象之一部分。成化(1465-1487)中南直隸江陰人卞榮(1419-1487)詩曰：「細箒翩翩出蜀中，令人千載憶蠶叢。」<sup>120</sup>正德中，浙人倪宗正收到禮部同僚、蜀人余才所贈川扇，亦強調其地域特徵：「蜀藤如石練為玉，蜀江之水經百濯。」<sup>121</sup>吳門名士祝允明寫詩催人送川扇道：「芙蓉城裡風千斛，要割些些與所知。」<sup>122</sup>到了晚明，王士性(1547-1598)更稱：「蜀錦、蜀扇、蜀杉古今以為奇產。」<sup>123</sup>

但川扇並不單純彰顯地方性。卞榮上引詩接著就說川扇「半規如月形容

<sup>119</sup> [明]楊慎，《升菴集》，卷31，〈謝同鄉諸公寄川扇二首〉，頁224-225。

<sup>120</sup> [明]卞榮，《卞郎中詩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3，〈謝同年大司徒黃公叔高惠扇〉，頁427。黃叔高名鎬，成化十六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十九年致仕，道卒，見[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157，〈列傳第四十五·黃鎬〉，頁4301；故此詩當作於此期間。

<sup>121</sup> [明]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4，〈謝余儀制惠扇〉，頁546；[明]林堯俞等纂修，[明]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42，〈歷官表·儀制司郎中〉，頁773：「俞(余)才」；卷43，〈歷官表·主客司郎中〉，頁808：「倪宗正」、「余才」。

<sup>122</sup> [明]祝允明，《枝山文集》，卷4，〈丁希信許扇不至〉，頁24b。

<sup>123</sup> [明]王士性撰，呂景琳點校，《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5，〈西南諸省〉，頁107。

好，一統中華製度同」，<sup>124</sup>在摺扇日益普及的成化朝，川扇被感知為全國摺扇風潮的一部分。其後祝允明又提到當時有扇骨「刻竹節文」的新式川扇，<sup>125</sup>今未見實物，不過故宮所藏宣德朝大摺扇，大骨已模擬竹節之形，<sup>126</sup>亦提示我們川扇與宮廷好尚間的某種互動。

嘉靖中川扇成為歲進，其命運與宮廷更緊密地聯繫起來。貢扇的形制、風格受皇家要求約束，嘉靖四十三年命四川布政司添造川扇柄小者、細巧者，特別吩咐「不許粗重」；<sup>127</sup>萬曆二十八年貢扇「內多粗糙不堪，又且不合原發式樣」，<sup>128</sup>觸怒龍顏，引起不小風波。<sup>129</sup>為進貢，川扇的「方物」性格甚至也受到一定侵蝕，萬曆時製扇需用的赤金已是「零星輾集」、「尋取於雲南地方」。<sup>130</sup>

晚明川扇縮合了川蜀特色與宮廷品味，人們或將川扇與內府所製「宮扇」並稱，<sup>131</sup>或徑稱川扇為「宮扇」：「險絕蠶叢地，繇來宮扇傳。」<sup>132</sup>其中，蜀王府的貢扇又尤其特殊。蜀府明初已貢扇，但正嘉年間蜀成王朱讓栩吟詠川扇遠多於之前的蜀王，<sup>133</sup>與當時川扇由採辦而定為歲進、風頭漸盛相應；嘉靖

<sup>124</sup> [明] 卞榮，《卞郎中詩集》，卷3，〈謝同年大司徒黃公叔高惠扇〉，頁427。

<sup>125</sup> [明]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4，〈又促金生許川扇不至（二首）〉，頁24b。

<sup>126</sup> 南訪，〈明代大摺扇〉，《文物》，8（1979），頁82。

<sup>127</sup> [明] 王圻，《續文獻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3，〈土貢考〉，頁358。

<sup>128</sup> [明] 程正誼，《程正誼集》，卷6，〈陳情引罪懇宥察官疏〉，頁178。

<sup>129</sup> 見陳旭，〈「化龍」遇「臥龍」〉，頁164-166。

<sup>130</sup> [明] 程正誼，《程正誼集》，卷8，〈四川徵採始議〉，頁218。

<sup>131</sup> 如前引方以智《物理小識》卷8「宮扇類」中有「宮扇、川扇」，又如弘光朝（1645）錢謙益降清禮單中有「宣德宮扇」、「真金川扇」、「百子宮扇」等，見[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2，頁27。

<sup>132</sup> [明] 陳三島，〈川扇〉，收入朱彝尊選編，《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79，頁3882。「宮扇」如今常被認為專指團扇，見華夫，〈扇、便面、團扇、羽扇、宮扇及其他——兼以「桃花扇」之爭謹致蔣星煜、嚴中諸先生〉，《濟南職業學院學報》，5（2007），頁81-83已指出這種認識的錯誤，本文所引諸多稱川扇為「宮扇」的材料，進一步表明明代「宮扇」可指摺扇。

<sup>133</sup> 朱讓栩《長春競辰稿》中富有蜀地、蜀府特色的扇詩，例如卷3，〈素扇〉、卷5，〈桐花鳳扇〉、卷6，〈答進扇者〉、卷8，〈柿油扇（借懷字一韻）〉、卷12，〈壽松扇〉，頁126-127、173、196-197。此前蜀王專門詠扇之詩似僅有[明]朱申鉉，《懷園睿製集》（成都：巴蜀書社，2018），卷9，〈扇〉，頁570-571。

二十六年成王還「進扇辭賞」，皇帝「嘉其誠懇」；<sup>134</sup>成王又以扇賞賜承奉、世子，<sup>135</sup>儼然仿效皇宮賜扇活動。同為蜀人，楊慎詠川扇尚以讚美故鄉風物為主，朱讓栩則在書寫川扇作為地方名產的特色的同時，不忘以之為王府與皇宮溝通的媒介。<sup>136</sup>蜀府扇貴為地方宮廷造物，庶幾也比一般的川扇更吸引人。前已述及沈德符、文震亨、方以智等人介紹川扇時皆對「精工」的蜀府扇有特寫，晚明徽、杭等地仿製川扇特別冠名「蜀府」，或許也兼有凸顯產品高檔性的意圖。

## （二）御賜川扇與士人情結

貢到的川扇多用於賞賜。<sup>137</sup>此前，端午賜群臣摺扇自永樂朝起漸成常制，原本「均及百官」，<sup>138</sup>正統（1436-1449）、景泰（1450-1457）中，隨著經筵制度正式建立，大臣、講官與朝參百官獲扇的規格日趨懸殊。<sup>139</sup>「賜輔臣、日講等官川扇」最早見於嘉靖十年五月三日實錄，前已述及。當時世宗在「大禮議」中正佔上風，提拔議禮新貴，且對經筵日講興趣漸濃，<sup>140</sup>端午賜川扇看似細枝末節，但突出了對近臣的優待、對經典學習的重視，亦可謂嘉靖前期氣象更新之縮影。

官方記載與獲賜者的詩文等顯示出，此後川扇之賜漸成常例，但仍屬特

<sup>134</sup>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卷322，嘉靖二十六年四月甲午條，頁5977。

<sup>135</sup> [明]朱讓栩，《長春競辰稿》，卷6，〈賜承奉周宣扇〉、〈扇面賜世子〉，頁187、194-195。

<sup>136</sup> 柯律格注意到明代王府作為「地區性的中心」，一方面彰顯地方特色，一方面又「複製」著「帝國中心」皇宮的文化，「地方思路」與「官方話語」並行不悖，見柯律格，《藩屏》，頁88-90、132、135、195。

<sup>137</sup> [明]王家屏，〈答維涇坡撫臺（蜀扇）〉，頁4249。

<sup>138</sup> [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16，成化元年四月甲辰，頁355。

<sup>139</sup> 明中期端午賜扇變化概況可參看[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卷16，成化元年四月庚子條，頁353；甲辰條，頁355；《明憲宗實錄校勘記》，頁65。本文側重川扇，關於明代宮廷賜扇與摺扇文化，容另文再論。

<sup>140</sup> 見謝貴安，〈明世宗經筵日講階段性特徵述論〉，《華中國學》，1（2016），頁111-114。

賜範疇。<sup>141</sup>萬曆朝賜川扇時間基本在端午前後；此前嘉靖時則有早在三月或遲至六月者。<sup>142</sup>萬曆《大明會典》稱嘉靖朝起賜川扇對象有「內閣輔臣，吏、禮二部尚書，及日講官講衍義官」，各類記載中，賜輔臣、講官較多，但也會特賜其他「勞臣」，如嘉靖中工部尚書雷禮以重建萬壽宮獲賜，<sup>143</sup>崇禎中兩淮鹽運使張緒倫、<sup>144</sup>禮科給事中姜埰（1607-1673）皆曾獲賜。<sup>145</sup>當然，獲賜之臣皆受君主特殊眷注。夏言嘉靖十至十五年連年多次獲賜川扇，和他當時以議禮「大蒙帝眷」、迅速升遷直至入閣若合符節。<sup>146</sup>後來居上的權臣嚴嵩，也有詩志川扇之賜：「竊祿南宮無補報，年年頒賜沐恩光」、「蜀王新貢金花箑，御苑傳呼賜禮卿」，<sup>147</sup>頗為風光。

賜川扇不限於端午，但端午時賜百官扇的普遍，尤能反襯出近臣獲賜川扇的殊榮。正如沈德符所說：「凡午節例賜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竹扇之下者」大概是宮中自製，如宦官劉若愚（1584-？）所記司禮監「以墨竹為骨」、「極易脆裂」<sup>148</sup>之流，工藝水平遜於川扇。萬曆中戴新寫給浙江杭嚴道僉事王應乾的端午節賀啟，以

<sup>141</sup> 嘉靖十年以降，實錄、起居注賜扇記錄，以及重臣、講官的紀賜之作屢見不鮮，茲不一一。

<sup>142</sup> 三月，見〔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卷161，嘉靖十三年三月辛卯條，頁3592；〔明〕雷禮，《鐔墟堂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謝賜川扇〉，頁172。六月，見〔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5，〈謝賜小暑節銀鉸畫骨川扇并十二香茹疏（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九日）〉，頁682。

<sup>143</sup> 〔明〕雷禮，《鐔墟堂摘稿》，卷1，〈謝賜川扇〉，頁172。

<sup>144</sup> 〔清〕張貞，《杞田集》，卷12，〈先叔父侍御府君行略〉，頁713。

<sup>145</sup> 〔明〕姜埰，《敬亭集》，卷4，〈寓宣州馬氏祠感舊追作〉，頁164-165。

<sup>146</sup> 其謝賜川扇各疏，見〔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5，頁665、666、669、671、675、681、682，首篇〈同吏部侍郎徐縉等謝賜扇疏〉無日期，疏云「今月初三日伏蒙聖恩賜臣等日講官川扇各五握」，應即實錄所載嘉靖十年五月初三事。夏言此階段仕途，見〔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196，〈列傳第八十四·夏言〉，頁5192-5194。

<sup>147</sup> 〔明〕嚴嵩，《鈐山堂集》（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15，〈賜川扇在西苑作〉，頁144-145。

<sup>148</sup> 〔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20，〈飲食好尚紀略〉，頁180。

祝願「大內時頒蜀扇」作結，被作為範文收入《啟雋類函》，<sup>149</sup>獲賜川扇成為官運亨通的隱喻。

「經幃特賜」<sup>150</sup>的川扇亦凸顯了講官作為皇帝老師蒙受的特恩。<sup>151</sup>于慎行（1545-1607）萬曆四至十七年任講官，乞休歸田後，仍為自己當年身為「儒臣」「寵賚便蕃」「即勳貴大臣有不與焉」而自豪，他作詩盤點自己所獲賞賚，其中就有〈賜畫面川扇〉。<sup>152</sup>特賜講官之物林林總總，但比起其他錢物酒食，摺扇尤宜把玩、展示、收藏，不僅「手持身佩，益當重上賜於千鈞」，<sup>153</sup>還可「誇示閭里」「留詒子孫」，<sup>154</sup>或者隨葬，成為曾親侍講幄者仕宦生涯的特別紀念。

川扇的賞賜情況，亦被視為君臣關係的某種標誌。萬曆中，王家屏批評川扇「賜予無節」，尤其是賜給宦官過多、「以賜文武大臣無幾耳」，<sup>155</sup>王家屏並不貪圖川扇，還反對川扇的進貢，他對賜扇之偏的批評，多少含有對當時「君臣之誼隔」<sup>156</sup>的慨歎。

而川扇作為特賜之物既已令人印象深刻，即便現實中未必獲賜，夢中由

<sup>149</sup> [明]戴新，〈賀抗嚴道王公午節啟〉，收入[明]俞安期等編，《啟雋類函》（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78，〈臬司部三·賀端午（回答附）〉，頁722-723。王應乾，見[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8，萬曆四十四年九月一日，頁546；[明]蔡獻臣撰，廈門市圖書館校注，《清白堂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卷5，〈王弘臺少方伯視海序（丁巳）〉，頁188-189。

<sup>150</sup> [明]陸深，《儼山集》，卷28，〈謝賜川扇〉，頁175。

<sup>151</sup> 講官的特殊地位及所獲特賜，見謝盛、謝貴安，〈明代經筵講官與皇帝的特殊師生關係考論〉，《華中國學》，7：2（2016），頁163-185。

<sup>152</sup> [明]于慎行，《穀城山館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6，〈紀賜四十首（有序）〉，頁150、153-154。

<sup>153</sup> [明]陸深，《儼山集》，卷28，〈謝賜川扇〉，頁176。石守謙，〈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流行〉，頁28指出「摺扇的隨身特質」使得山水扇畫的意蘊「產生一種時刻不能或忘的強度」，不帶書畫的御賜川扇實也有此效果，當然其具體內涵與蘇式書畫扇不同。

<sup>154</sup> [明]顧鼎臣，〈謝賜川扇表（嘉靖十七年）〉，頁82。

<sup>155</sup> [明]王家屏，〈答雋涇坡撫臺（蜀扇）〉，頁4249。

<sup>156</sup> [明]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4，〈乞罷歸以全臣節疏〉，頁59。

皇帝授予的川扇也可成為一種激勵。徐如珂(1562-1626)萬曆中貶謫雲南期間，夢見神宗從袖中取出三柄川扇，命他「手持遺皇太孫」，他單手接扇，雙手捧獻給皇長孫。徐天啟元年(1621)升川東兵備副使，值奢崇明父子叛亂，他感到當年所夢正是預言：「今三川扇動，隻手撐持，以還聖主。死可以報命神祖，他何望哉！」果真立下戰功。<sup>157</sup>此夢可謂其報國之情的投射，而川扇在夢中既暗示著蜀地情勢，又代表了君上的囑託。

士大夫對御賜川扇的情結，易代後猶一時縈繞不去。距離最近的崇禎朝之賜扇尤其令舊臣遺民感懷。談遷(1594-1657)稱「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寢之」，意在推許「先帝儉德」，<sup>158</sup>不盡符合史實。崇禎十五年五月禮科給事中姜採獲賜川扇，後來他在宣州作「感舊」詩回憶此事。<sup>159</sup>姜採的同年吳偉業(1609-1672)圍繞宮中川扇寫下長詩〈宮扇〉，也聚焦於崇禎時特賜講官川扇之情節，以及鼎革後重睹舊扇之況味：

遭逢召見南薰殿，思陵日昃猶揮汗。天語親傳賜近臣，先生進講幽風倦。黃羅帕捧出雕闌，畫簷丹青掌上看。俸薄買嫌燈市價，恩深攜謝閣門班。……兩夜牀頭搜廢篋，摩挲老眼王家物。……莫歎君恩長斷絕，比來舒卷仍鮮潔。乍可襟披宋玉風，不堪袖掩班姬月。<sup>160</sup>

獲賜川扇的意義自然不僅是省去了昂貴的「燈市價」，購自市場的川扇終究與承載天恩的御賜川扇意蘊不同。而當這柄「王家物」成為前朝和已「斷絕」的「君恩」的象徵，其內涵更是空前沉重，縱然「舒卷仍鮮潔」，也令人不忍使用了。

<sup>157</sup>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明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贈一級徐公墓誌銘〉，頁1066；[清]黃中堅，《蓄齋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8，〈明南京工部侍郎念陽徐公傳〉，頁417。

<sup>158</sup> [明]談遷，《叢林雜俎》，和集，〈叢贅·先帝儉德〉，頁603。

<sup>159</sup> [明]姜採，《敬亭集》，卷4，〈寓宣州馬氏祠感舊追作〉，頁164-165。

<sup>160</sup>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3，〈宮扇〉，頁60。

### (三) 饋贈佳品與官場故事

「或進上方，或承筐是將。」<sup>161</sup>蜀府、川省官員在造扇、貢扇之外，普遍以川扇作交際餽贈之用。<sup>162</sup>明中期蜀王、四川鎮守中官就多以川扇饋贈來蜀官員。<sup>163</sup>嘉靖時，川省「三司以下有公私贖，如川篋、蜀錦與道途之費，不下數百金」已成「故事」，郭民敬嘉靖三十七年巡按四川，布政使「持篋、錦前獻，郭驚走退避」，被視為廉潔。<sup>164</sup>萬曆中王象乾（1546-1630）巡撫四川，葉向高（1559-1627）特意稱述他「釋事東歸，囊中無一蜀紈」。<sup>165</sup>

不過，王象乾督蜀時本身亦殷勤送扇。<sup>166</sup>藉由貢扇的機會，還可以額外之扇餽贈京城人士，尤其是京官要員。萬曆中，王家屏在貢扇到京之際，便收到蜀撫維遵「私貺」之扇，他起初驚訝，後「乃知故事相沿已久」。<sup>167</sup>晚明蜀官多視送川扇為分內事，造扇是川省負擔的一部分，但深感川省「困累已甚」的官員如左布政使程正誼，<sup>168</sup>也不忘給內閣輔臣、其浙江同鄉沈一貫（1537-

<sup>161</sup> [明]王志遠，〈蜀扇銘〉，收入[明]杜應芳、[明]胡承詔輯，《補續全蜀藝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7，頁431。「承筐是將」典出《詩·小雅·鹿鳴》，朱熹注：「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見[宋]朱熹集撰，王華寶整理，《詩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115。

<sup>162</sup> 承匿名審查人提醒，方物與扇子在明代皆為常見的禮物，並建議參考劉斐，〈明代士人的禮物與送禮文化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遺憾的是該文因作者擬修改後再公開，筆者暫時未能參考原文。

<sup>163</sup> 弘治中四川參議虞臣拒絕了蜀王「扇千柄」，見[明]方鳳，《改亭續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4，頁458；正德中華昶「升四川左參，鎮守內臣饋金鉸扇百握」，華昶「對使者悉焚之」，見[明]劉廣生修，[明]唐鶴徵等纂，[萬曆]《常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13，頁40-41；[萬曆四十七年]《四川總志》，卷3，〈省志三·秩官·布政使司年表〉，頁54。

<sup>164</sup> [明]張瀚撰，盛冬鈴點校，《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7，〈忠廉紀〉，頁131-132；[萬曆四十七年]《四川總志》，卷3，〈省志三·秩官·巡按御史表〉，頁49。

<sup>165</sup> [明]葉向高，《蒼霞續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3，〈大司馬王公考績內擢序〉，頁629。

<sup>166</sup>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31，〈謝王齋宇中丞川扇〉，頁698；[明]劉士驥，《蟋蟀軒草》（濟南：齊魯書社，1997），〈謝大中丞王年伯惠川扇〉，頁527。

<sup>167</sup> [明]王家屏，〈答雒涇坡撫臺（蜀扇）〉，頁4249。

<sup>168</sup> 程正誼對川省艱苦的陳述，見[明]程正誼，《程正誼集》，卷8，〈四川徵採始議〉，頁218-219。

1615) 送扇。<sup>169</sup>當然，若與仕蜀者關係密切，即使離京、在野，亦可得扇。王象乾的親家邢侗就以書扇六柄要求交換二三十柄川扇，表示要「散之諸兒侄。以伯翁督此地，封胡羯末，人人思把握蜀蠶耳」。<sup>170</sup>

晚明四六選本《啟雋類函》專辟「謝送扇」一欄，類書《四六霞肆》中亦有「撫臺送扇」、「中丞扇」等，<sup>171</sup>所收基本為謝蜀撫送川扇之作，不但反映贈扇之風氣，也說明蜀撫作為送扇者的形象深入人心。這類謝啟已然格套化，一般稱頌川扇之寶貴、贈扇官員之美政，但事實上，贈扇故事所寄生的貢扇之制，在晚明實為眾所周知的弊政。也正因此，川扇之禮有時也會引發不滿。王家屏收到雒遵贈扇後不但不言謝，還有責備：「在我手袖者，猶不能無所予，而況爭議於人主之前，欲以樽節其出入，豈不難哉！」<sup>172</sup>後來幾任蜀撫依舊給他寄扇，他不再長篇大論，但仍流露出對此「故事」的意見：「是惟乘輿得用，夫豈臣下可將」、「即得一而已多，乃累百其未已」。<sup>173</sup>

儘管如此，川扇仍是公認的貴重禮物，從晚明小說中也可見一斑，《鼓掌絕塵》中韋丞相欲向婁公子借寶藥，準備的「幾件出得手的」禮物就有：「右軍墨蹟二幅、象牙八仙一副、真金川扇十柄、琥珀扇墜四枚」。<sup>174</sup>除了國內流通，川扇還作為外交禮品流播到國外。嘉靖十三年，陳侃出使琉球，臨別時國王尚清「手持泥金倭扇二柄」以贈，明使「各答以所持川扇」，尚清「喜不

<sup>169</sup> [明] 沈一貫，〈答左伯程居翁惠扇〉，收入 [明] 程正誼著，程朱昌、程育全編，《程正誼集》，頁 294-295；程正誼於萬曆二十三至二十七年任四川左布政使，當時沈一貫在閩，見陳旭，〈「化龍」遇「臥龍」〉，頁 160；[清] 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 110，〈宰輔年表二〉，頁 3371-3372。

<sup>170</sup> [明] 邢侗，《來禽館集》，卷 28，〈與蜀撫王齊宇〉，頁 665。

<sup>171</sup> [明] 俞安期等編，《啟雋類函》，卷 58，〈內臺部十一·謝送扇〉，頁 412-414；[明] 何偉然輯，《四六霞肆》（濟南：齊魯書社，1995），卷 15，〈交際·餽遺〉，頁 404-405、407。

<sup>172</sup> [明] 王家屏，〈答雒涇坡撫臺（蜀扇）〉，頁 4249。

<sup>173</sup> [明] 王家屏，《王文端公尺牘》（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 2，〈謝徐華陽中丞送扇〉、〈謝李晉峰中丞送扇〉，頁 148。

<sup>174</sup> [明] 金木散人編，李落、苗壯校點，《鼓掌絕塵》（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頁 204。

自勝，再拜而別」。<sup>175</sup>十八年，出使朝鮮的薛廷寵也以「蜀扇二握」等物為贈。<sup>176</sup>當初也許以學習日本扇起家的川扇，至此已以中華名產的面貌走出國門了。

#### （四）時尚商品與文人品鑒

川扇產量巨大，饋贈成風，但要達到「上自宮禁，下至士庶」的流行度，少不了市場的推波助瀾。正德中，川扇據說已「京華年來得高價」，嘉靖以降，歲貢名品更成為時尚商品，市場中川扇種類多樣，價亦懸殊，「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銖而已」。<sup>177</sup>益宣王棺內出土的一柄川式扇大骨內側墨書「價廿五」，應指 25 兩白銀，更高過「黃金一兩」。<sup>178</sup>宮中川扇應主要通過內市、燈市、城隍廟市等流出，<sup>179</sup>跨地域的市場網絡中當也有川扇直接從四川販往他處，<sup>180</sup>還有就是徽、杭等地仿製的「蜀府」扇。朱守城墓出土的川式扇中，扇骨上泥金小楷、落款「吳舜卿真金巧扇」者（圖 7），當為面向市場製作。川扇應也隨年份而增值，乃至出現了方以智所說「以紙封而煙熏之」的做舊者。

川扇既帶有宮廷光環，作為一種商品，總體上也頗具高檔感，在晚明流行小說中，它常常是富貴、體面的代名詞。如《金瓶梅》中西門慶就說：「我

<sup>175</sup> [明] 陳侃，《使琉球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11-512。

<sup>176</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纂，《中宗實錄》，收入該會編纂，《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卷 91，中宗三十四年八月己卯條，頁 326。

<sup>177</sup> [明] 謝肇淛，《五雜俎》，卷 12，〈物部四〉，頁 241；[明] 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 4，〈謝余儀制惠扇〉，頁 546。

<sup>178</sup> 萬曆間金銀比價大致在 1：7、1：8 左右，見黃阿明，〈明代貨幣與貨幣流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頁 189。

<sup>179</sup> [清] 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 3，〈宮扇〉，頁 60：「俸薄買嫌燈市價」；燈市之外，晚名城隍廟市「有內府扇曰宮扇」，內市亦多宮中精品，應都可能買到宮中流出的川扇，見 [明] 劉侗、[明] 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卷 4，〈西城內·城隍廟市〉，頁 166；安藝舟，〈明代的內市與燈市〉，《歷史教學》，10（2015），頁 39-40。

<sup>180</sup> 王士性說入蜀的商人「雖僻遠萬里，然蘇、杭新織種種文綺，吳中貴介未披而彼處先得。妖童變姬，比外更勝，山珍海錯，咸獲先嘗」，見 [明] 王士性，《廣志繹》，卷 5，〈西南諸省〉，頁 107。可見蜀地與他處的商品流通。

可惜不曾帶得好川扇兒來，也賣富賣富。」<sup>181</sup>《警世通言》中王景隆落魄京城，得玉堂春接濟，「隨即到了市上，買了一身衲帛衣服，粉底皂靴，絨襪，瓦楞帽子，青絲條，真川扇，皮箱騾馬，辦得齊整。」<sup>182</sup>強調「好川扇」、「真川扇」，又側面顯示製造、仿製之濫，不過，即便只購置「數銖」的「下者」或仿品，應也可聊以跟隨時尚、裝點門面。

而伴隨著使用者的奢侈逸樂，川扇也沾染上風流甚至輕浮的意味。《金瓶梅》中的川扇，在「賣富」之外，亦表徵了西門慶的「博浪」，還為「風月中事」所慣用。<sup>183</sup>又據張岱（1597-1679）回憶，天啟間友人秦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他鬥雞賭博而屢輸，<sup>184</sup>川扇乃是紈袴子弟揮霍無度之一端。

謝肇淛認為：「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筭中則婦女手中耳。」<sup>185</sup>川扇在一些人眼中，誠然不如蘇扇契合文人審美。萬曆中嘉興人鍾夏作〈素扇行〉，即以華美但無書畫的宮廷川扇，來反襯蘇扇的素雅與藝術性：

蜀王府中製奇扇，鏤邊飾寶泥金面。龍函捧獻明光宮，賜之彩幣兼華宴。來往星馳驛騎勞，祇錫才人最恩眷。吳門巧作素白良，欺霜妒月凝輝光。圖山寫石各工意，八分草聖爭誇長。……。<sup>186</sup>

方以智崇禎中流寓南京，發現「南中好持川扇，不喜有書畫者」，作詩流露出對川扇不宜書畫的不滿：「欲製齊紈詠婕妤，臨池汗下不能書。近來重得成都扇，卻又嫌人學子虛。」<sup>187</sup>他另有詩詠御賜川扇，雖說「恩藏懷袖寬」，但不

<sup>181</sup> [明]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中）》，頁 711。

<sup>182</sup> [明] 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頁 350。

<sup>183</sup> [明]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上）》，頁 24、88。相關分析可參白維國，〈《金瓶梅》與摺疊扇〉，頁 115-117。

<sup>184</sup> [明] 張岱撰，馬興榮點校，《陶庵夢憶》（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3，〈鬥雞社〉，頁 42。

<sup>185</sup> [明] 謝肇淛，《五雜俎》，卷 12，〈物部四〉，頁 241。

<sup>186</sup> [明] 鍾夏，〈素扇行〉，收入 [清] 沈季友編，《攜李詩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3，頁 314；[明] 樊維城、[明] 胡震亨等纂修，[天啟]《海鹽縣圖經》（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15，〈人物篇第六之六·國子生·萬曆中〉，頁 627。

<sup>187</sup> [明] 方以智，《流寓草》，卷 9，〈秦淮漫興十首·其四〉，頁 198。

忘提及「詩就無題處」<sup>188</sup>。

反觀一些明墓中書畫與無書畫扇分屬男女，曾有學人認為可能有性別區分意涵，<sup>189</sup>行文至此可知，川扇雖然上至「中宮」、「貴嬪」，下至社會女性都有使用，但並不專屬婦女，部分男墓主特別選擇以書畫扇而非川式扇隨葬，一定程度上如吳雪杉所言，體現了一種「文化權力，即對於書法、繪畫欣賞與觀看的佔有」。<sup>190</sup>但這大概不僅是要區別於「婦女」，也是要和單純的「富人」相區隔。不過，明墓隨葬摺扇仍以無書畫的川式扇佔多數，既應與當時書畫扇面常被從扇骨上拆下、「別裝卷冊以供玩」<sup>191</sup>的風氣有關，也提示我們川扇的流行程度。

其實，正如晚明王經在擬人「假傳」中對川扇的描述：「西蜀尤多綽約輕娟，善伺人意，隨宜上下，甚多風致，惟性不嗜吟詠繪畫，人亦諒之。」<sup>192</sup>雖然川扇殊乏書畫之雅，不少文人雅士仍頗愛之，包括江南的知名賞鑒家。明中葉吳門文士李應禎（1431-1493）稱川扇有使用上的「三益」：「障日、障小雨、可支額小睡」；其婿祝允明則從審美角度揀擇，「喜黑漆，惡金漆者」，又喜直骨，稱「刻竹節文，徒勞更無趣」。<sup>193</sup>到了晚明，浙江嘉興人沈德符雖對川扇充貢頗有微詞，但也仍許之為「雅」：「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豔女。」且強調「宮掖所尚，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文震亨在川扇與家鄉蘇扇間的取捨，更是耐人尋味：

今之摺疊扇……川中蜀府製以進御，有金鉸藤骨、面薄如輕綃者，最為貴重；內府別有彩畫五毒、百鶴鹿、百福壽等式，差俗，然亦華綺可觀；徽、杭亦有稍輕雅者；姑蘇最重書畫扇……紙敝墨渝，不堪懷

<sup>188</sup> [明]方以智，〈御賜宮扇五柄〉，收入[清]潘江輯，彭君華主編，《龍眠風雅全編》（合肥：黃山書社，2013），卷43，頁1701。詩中說「錦江金折扇，雲片九螭盤」，當為螭紋川扇。

<sup>189</sup> 石守謙，〈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流行〉，頁24；吳雪杉，〈金扇〉，頁142-145；劉芝華，〈非書畫吳扇的源起及性別建構〉，頁511-516。

<sup>190</sup> 吳雪杉，〈金扇〉，頁144。

<sup>191</sup> [明]文震亨，《長物志校注》，卷7，〈器具·扇、扇墜〉，頁291。

<sup>192</sup> [明]王經，〈清風先生傳（扇）〉，收入[明]陳邦俊輯，《廣諧史》，卷5，頁351。

<sup>193</sup> [明]祝允明，《枝山文集》，卷4，〈又促金生許川扇不至（二首）〉，頁24b。

袖，別裝卷冊以供玩，相沿既久，習以成風，至稱為姑蘇人事，然實俗製，不如川扇適用耳。<sup>194</sup>

在他看來，蜀府進貢的川扇是宮廷摺扇的最高水準，內府特有的畫面川扇與以仿製川扇著稱的徽、杭扇，<sup>195</sup>亦皆有可取者，姑蘇書畫扇看似風雅，實是流俗。文震亨對川式扇的總體評價高於蘇扇，除了自別於當時附庸風雅者，並推崇川扇的適用，也表現出對由宮廷所領銜、以川扇為代表的摺扇品味的相對認可。

又由於川扇性能優異，就連投合文人雅好的蘇扇，也追求在實用性上與之靠攏。晚明吳中製扇高手劉玉臺，主打產品為「光滑可鑒」的白竹扇骨，風格雖與川扇迥異，但他仍以作品「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自誇。另一方面，晚明宮中也兼用蘇州扇：「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詩以賜宮人者，皆吳扇也。」<sup>196</sup>川扇與蘇扇同時盛行，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當時宮廷與文人品味不僅共同引領時尚，還彼此取資與交融，文人品鑒中的雅俗標準，也頗具多樣性與流動性。

### （五）上供爭議與品質批評

但若著眼於國計民生，川扇的進貢就不免受批評。前已論及正德中造扇已被蜀民視為苦差，到萬曆時，反對貢扇之聲更為激烈。王家屏指出貢扇對國家與地方都有害無益：「官耗其職」、「民妨其業」、「天下之租一而蜀中之租二」、「無益於上用，盡以供闈宦之資」，並點明：「舉一扇而他物入貢者大都類此矣。」<sup>197</sup>王家屏萬曆十二年（1584）入閣，疏請「省蜀扇之貢」，報聞而

<sup>194</sup> [明]文震亨，《長物志校注》，卷7，〈器具·扇、扇墜〉，頁291。標點有調整。

<sup>195</sup> 劉芝華，〈非書畫吳扇的源起及性別建構〉，頁505。據《長物志》此條認為「蜀府扇的生產地有三：四川、宮廷、徽杭。」然而結合沈德符所謂「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內府別有」諸式當指貢入內府的特殊式樣川扇，非內府自製。

<sup>196</sup>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12，〈物部四〉，頁241；[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14，〈箒〉，頁418。按「劉玉臺」，謝作「柳玉臺」，因張「曾識其人」，此暫從張。

<sup>197</sup> [明]王家屏，〈答雒涇坡撫臺（蜀扇）〉，頁4249。

已。<sup>198</sup>當時神宗業已擺脫張居正（1525-1582）的牽制，一反初年勤政節儉之姿態，而「日黷貨」，<sup>199</sup>川扇的添造可謂一斑。二十三年，御史周希聖又上疏：

蜀地傳造扇柄，倍溢往額，竊思蜀民經黑番之跳梁、播酋之驚驚，奔走於徵兵運餉，力既不支，而又以午夏所用一物，窮極雕飾，殫竭膏脂，恐為聖德之累，乞賜罷免。<sup>200</sup>

周曾任成都府華陽縣令，據說他見貢扇「大為邑困」，「出俸錢佐之猶不支，為之不食而泣」。他秩滿擢升山東道御史，適聞川扇添造，中官催迫甚急，遂慷慨具疏，閣臣、蜀人陳于陞（1536-1596）對他表示欽佩，然周終究因「沽直要名」，被罰俸一年，並謫灌陽典史。「進解造扇如故」。<sup>201</sup>

在晚明的川省，相比皇木、礦稅、兵事等負擔，貢扇的耗費從數字上來看尚不算大宗，<sup>202</sup>但在國家多事、財政日蹙之際，玩好之物的上供可謂徒添不必要的紛擾。當時官員批評各種無益上供，籲請將其暫停、折色充餉，每每將川扇與蘇、杭、陝西之織造與江西之瓷器燒造等並列。<sup>203</sup>前已述及天啟中因西南用兵、三殿大工，川扇被停貢折銀，而當四川巡按吳尚默「因貢扇允折，並議將茶蠟各項俱請改折」，則被以「上供急需」為由拒絕。<sup>204</sup>川扇的

<sup>198</sup>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217，〈列傳第一百五·王家屏〉，頁5727；[清]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13下，〈王家屏傳〉頁2079。

<sup>199</sup>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82，〈食貨六·採造〉，頁1994。

<sup>200</sup>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285，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己卯條，頁5277。

<sup>201</sup>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285，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己卯條，頁5277；[清]王元弼修，[清]黃佳色纂，[康熙]《零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9，〈名臣·明〉，頁152-153。

<sup>202</sup> 貢扇價銀目前可見天啟四年分為11,087兩，見[明]朱燮元，《少師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6，〈催餉辭銜免扇疏〉，頁189；萬曆三十五年四川採辦皇木「約費四百餘萬金」，見[萬曆四十七年]《四川總志》，卷21，〈經略志一·木政〉，頁648；萬曆二十七至三十四年四川稅監單年進奉銀兩也常達數萬，見南炳文、湯綱，《明史》，下冊，頁739-742。

<sup>203</sup> 如[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227，〈列傳一百十五·謝杰〉，頁5967-5968；[明]華顏，〈庫貯已空國計日縮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冊28，卷30，〈己未季秋二〉，頁16b；[明]喬拱璧，〈直陳禍福以效孤忠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冊29，卷31，〈己未孟冬一〉，頁51a。

<sup>204</sup> [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卷73，天啟六年閏六月丙辰條，頁3548。

不急需實為眾所周知。

可儘管如此，仍有一群人視川扇為利藪而不願放手，萬曆朝的貢扇數額高居不下的背後，除了皇帝「黷貨」，相關內外官員也乘機中飽私囊。二十八年貢扇粗糙，有的說是程正誼「以蜀方多事，而復以玩好之物重為民累，恐遂為例」，故意命令造扇「毋為美好，冀幸免於歲額也。」<sup>205</sup>但又據說「扇惡」實為「中璫索常例不遂」而予以報復的藉口。<sup>206</sup>四十七年(1619)，布政司貢扇又「粗惡不堪、樣數短少」，朝廷「命該省撫按究原委，通判李盤等贓罪以聞」。<sup>207</sup>實則當時該司貢扇「每差出，僚儕紛起圖之」早成常態。<sup>208</sup>

這終非長久之計。不論萬曆年間貢扇粗糙的內幕究竟如何，在巨額需索的壓力與地方動亂的影響下，當時川扇品質下降已是大勢所趨。朱孟震仕蜀期間給邢侗寄扇，說「蜀箏近製日就粗惡」，<sup>209</sup>不全是謙辭。王士性也說川扇「為朝廷、官府取用多，近皆濫惡不堪。」<sup>210</sup>極盛之時，衰象已露。

然而等到明亡後川扇之貢真的成為歷史，它卻又成為了懷念的對象。吳偉業的長詩〈宮扇〉以「宣皇清暑幸離宮」開篇，恰與本文推測的鎮守中官最初進獻川扇的時代吻合，不過，詩人也許只是以宣德朝指涉明代的強盛期，而川扇的進貢乃是詩人神往的盛世的一部分：「玳瑁簾開南內宴，沉香匣啟西川扇。」「峨眉萬里尚方船，雉尾千秋奏御箋。」詩人亦費了不少筆墨描繪川扇的精美，但不言其質量在明季的下滑，川扇的厄運被直接歸因於明季的戰亂：「聞道烽煙蔽錦城，齊紈楚竹無顏色。」<sup>211</sup>吳詩與晚明反對貢扇的人士一樣，將其與明朝的國運相聯繫，不同之處在於，比起揭露貢扇對國家的損耗，詩中表現出的更多是對故國文物的深情，是舊臣對川扇的一種選擇性記憶。

<sup>205</sup> [明]韓敬，〈大京兆程公居左先生傳〉，頁284。

<sup>206</sup> [明]牛應元，〈山西按察司僉事前四川布政司參議劉公墓表〉，收入[清]葛晨纂修，[乾隆]《涇陽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10，頁175。

<sup>207</sup>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580，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庚寅條，頁10974。

<sup>208</sup> [明]劉鴻訓，《四素山房集》(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16，〈承務郎四川布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華鉉王公墓誌銘〉，頁311。

<sup>209</sup> [明]朱孟震，《朱秉器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卷4，〈答邢子願〉，頁579。

<sup>210</sup>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5，〈西南諸省〉，頁107。

<sup>211</sup> [清]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3，〈宮扇〉，頁60。

## 結語

「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入清後，川扇不但不再進貢，而且本身也作為勝國舊事，淡出多數人的生活與視野。王士禛（1634-1711）注意到「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sup>212</sup>崇尚金飾的川扇應也不再流行。吳懋謙（1615-1687）順治十五年（1658）「偶客都門」，稱川扇「可憐兵火後，零落已全無」。<sup>213</sup>陸氏後人陸錫熊（1734-1792）向友人展示當年陸深獲賜的金扇，阮葵生（1727-1789）描述其為「百龍之式，雖駁落已甚，而璀璨可觀，當是川製」，諸友作聯句詠之，奉為珍寶。<sup>214</sup>

不僅遺物寥寥，康熙（1662-1722）中入蜀尋訪之士不約而同地發現，川扇工藝在當地也已失傳。<sup>215</sup>明清之際四川因戰亂凋敝特甚，後又有大量外省移民湧入，地方文化發生一系列流變，<sup>216</sup>摺扇製造的衰微可謂其一。道光（1821-1850）中仕蜀的王培荀（1783-1859）仍在感慨：

蜀自張獻忠摧殘，後孫可望盡掠川中巧匠入黔，一切擅名天下之物，不可復見。……明時川扇猶為至佳……今惟榮昌縣有骨扇，以絹為面，以絨貼花，尚不及豐潤扇之工細，亦下品也。<sup>217</sup>

重慶府榮昌縣的摺扇如今或被與明代川扇相聯繫，<sup>218</sup>然而乾隆《榮昌縣志》

<sup>212</sup> [清]王士禛撰，宮曉衛點校，《香祖筆記》（濟南：齊魯書社，2007），卷1，頁4463。

<sup>213</sup> [清]吳懋謙，《芋菴二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6，〈長安詠懷〉，頁742、744。

<sup>214</sup>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19，頁464；[清]吳省欽，《白華前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4，〈嘉靖宮扇聯句〉，頁136-137。

<sup>215</sup> 康熙二十二年（1683）使蜀的方象瑛說：「蜀錦、川扇，屠戮後，法皆絕矣。」見[清]方象瑛，《健松齋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7，〈使蜀日記〉，頁127。三十五年王士禛使蜀，見成都居民「土著什不得一，至於錦扇等製，詢之，皆懵然不知，況其遺法耶。」見[清]王士禛撰，郭香圃點校，《隴蜀餘聞》（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3624。

<sup>216</sup> 見賴悅，〈清代移民與四川經濟文化的變遷〉，《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00），頁147-153。

<sup>217</sup> [清]王培荀著，魏堯西點校，《聽雨樓隨筆》（成都：巴蜀書社，1987），卷6，頁376-377。豐潤畫扇乾隆間開始流行，見[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19，頁464。

<sup>218</sup> 例如金馬，〈四川扇子與朝鮮摺扇〉，頁19；楊可龍，〈「榮昌摺扇」技藝及其保護的

並未提到摺扇業，<sup>219</sup>同治《榮昌縣志·物產》始有「扇」條：

以紙為之，古稱摺疊扇，一名撒（撒）扇……撒（撒）扇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撒（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邑中職此業者不下千家萬戶，每年春間，各郡縣客商雲集於斯，販往他處發賣。<sup>220</sup>

似乎榮昌摺扇明代已由皇帝命令製造，與四川貢扇有關，然而「始於永樂中」、「命工如式為之」云云，其實是在介紹摺扇流行中國的原因，且沿襲了明人不準確的說法，<sup>221</sup>並非特指川扇，更非指可能晚清才興起的榮昌摺扇。

但別處仍有川扇的流裔，只是百姓漸漸日用而不知了。盛清時杭州摺扇「猶存蜀府名」，並保留了川扇柿漆塗面、輕盈適用的特點，唯其「質粗耐久」<sup>222</sup>的平民化面目已與前朝貢品相去甚遠。到了清末，王廷鼎（?-1892）認為柿漆黑紙杭扇「本為僕隸傭人所執」，<sup>223</sup>蓋已不詳杭扇與前明四川貢扇之聯繫。

綜觀川扇的興衰，可見川扇幾乎與明王朝的命運相始終。永樂初日本摺扇受朱棣青睞，首位蜀王投其所好進貢摺扇，此後川扇聲名日著，可能宣德時起被鎮守中官作為「孝順」進獻，正德時採辦頗繁。嘉靖初川扇被定為歲進，由四川布政司製造、四川巡撫奏進，並用以賞賜重臣、講官等，至萬曆朝盛極。明代宮廷推動了川扇盛行，但也攜川扇一同走向末路。萬曆中川扇的品質已受造辦壓力而下降，啟、禎朝多事，歲貢時斷時續，明亡後不但貢扇被永免，傳世的川扇遺存與四川原有的摺扇工藝也在易代戰亂中蕩然，盛極一時的川扇終成往事，平民化的杭扇已非前朝川扇本色。

比對文獻、圖像中的川扇與明墓出土的無書畫「金扇」，可知金扇應屬川式扇，而非日本扇、蘇扇或明器。出土的川式扇實物提醒我們川扇在明代尤

初步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14），頁9。

<sup>219</sup> [清]許元基纂修，[乾隆]《榮昌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頁49-99。

<sup>220</sup> [清]文康修，[清]廖朝翼纂，[同治]《榮昌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卷16，〈物產·扇〉，頁143。

<sup>221</sup>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5，頁52-53：「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

<sup>222</sup> [清]朱彝尊，《騰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8，〈油紙扇〉，頁252；[雍正]《浙江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101，〈物產一〉，頁2349。

<sup>223</sup> [清]王廷鼎，《杖扇新錄》，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生活與博物叢書·器物珍玩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501-502。

其晚明物質文化中的醒目位置，也具體展現了川扇的風格與品質。川扇作為明代高檔無書畫摺扇的代表，起初也許借鑒了日本扇，且傳世罕見，因而在今人看來有些許異域感，但至遲在晚明已樹立了自身的鮮明特點，華絢可觀又輕便適用，受到徽州、杭州等地的仿製，蘇州的製扇名手也服膺川扇的實用性。川扇標識了明代摺扇工藝的重要成就，也是書畫扇以外，明代以來中國摺扇發展的另一重要線索。雖然其工藝因易代之亂在當地失傳，與傳承至今的蘇扇相比顯得命運可慨，但川扇依舊澤及他方與後世：清代杭扇儘管已平民化，仍是在昔日仿製川扇的基礎上演變的。當然，在延續性之外，也需認識到歷史的斷裂，不應簡單將清代榮昌摺扇與明代川扇掛鉤。總之，川扇是我們更完整準確地考辨扇史所不應忽視。

從明人對川扇的書寫中，也可見摺扇在明代除了扇面書畫，還有更豐富的文化面向，其中宮廷（包括皇宮與地方王府）的影響不可小覷。明代宮廷不僅推動了摺扇這種舶來扇式在本土的普及，其所偏好的具體摺扇風格也強烈左右了明人的用扇風尚。川扇的馳名固然也緣於其優異品質、地方特色，但宮廷的推崇，尤其是嘉靖以降的歲進，是晚明川扇盛行的一大關鍵。每年被大量生產、進貢的川扇，復又被賞賜、饋贈、買賣、使用、品評，其意蘊已遠不止是一種方物。蜀府扇聯結著皇宮與蜀府，既別具政治意味，又因其高檔感而特受關注。特賜重臣、講官的川扇，象徵仕途殊榮、君恩深重，承載了士大夫的別樣情結，易代後猶令舊臣感念。在依託於進扇任務的官場故事中流動的川扇，則是公認的佳禮，引發著覬覦與爭議，蜀地官員尤其四川巡撫被視作典型的送扇者。而贈予外國的川扇，又標舉著中華風範。川扇更進入市場、成為流行並被仿製，既標榜富貴體面，又流露奢侈輕浮；雖多無書畫且常為富人、婦女所用，文人氣質不若蘇扇般典型，卻也頗受包括江南賞鑒家在內的文士們的好評，映射出宮廷與文人品味在時尚中的交錯。但與此同時，川扇也因上供的靡費與品質的下降而飽受批評，可是等到明亡後，貢扇又成為前朝追憶的一部分。摺扇的普及可謂是明人生活中的一種新變，而川扇與明代尤其晚明國計民生、世風人情的深密交織，則構成明代摺扇文化的重要內容，而且比起傳承至今的蘇式書畫扇，川扇更堪稱是有明「一時風會」的特殊標識。

本文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收稿；2021 年 6 月 2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趙子杰

## 附圖

圖 1 成都博物館「聚骨川扇」展板



展板中諸圖實為典型蘇式書畫扇面而非川扇。

資料來源：劉紫依 2019.10.29 拍攝，四川成都博物館。

圖 2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傳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宮川雅扇」店鋪



資料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569](https://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569)，

擷取日期：2021.4.14；更清晰之局部圖，

見許文美，〈明清摺扇藝術的發展〉，收入氏編，《惠風和暢：摺扇集萃特展》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147。

圖 3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繼妃孫氏棺出土摺扇



資料來源：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彩版頁 62（版權方：江西省博物館）。

圖 4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元妃李氏棺出土摺扇



資料來源：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彩版頁 60  
（版權方：江西省博物館）。

圖 5 圓頭黑漆灑金雕邊骨黑地幾何紋金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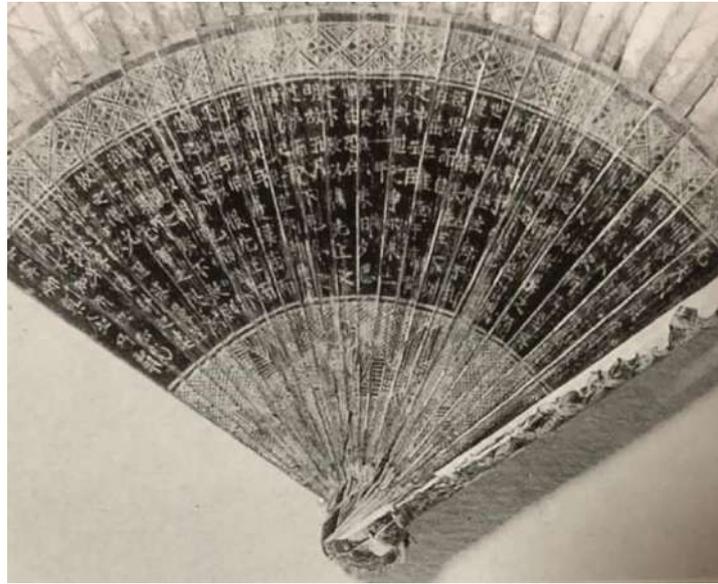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私人收藏，劉紫依 2019.1.17 拍攝，廣東廣州私宅。

圖 6 圓頭黑漆灑金雕邊骨黑地幾何紋金扇大骨局部



資料來源：私人收藏，劉紫依 2019.1.17 拍攝，廣東廣州私宅。

圖 7 上海朱守城墓出土吳舜卿真金巧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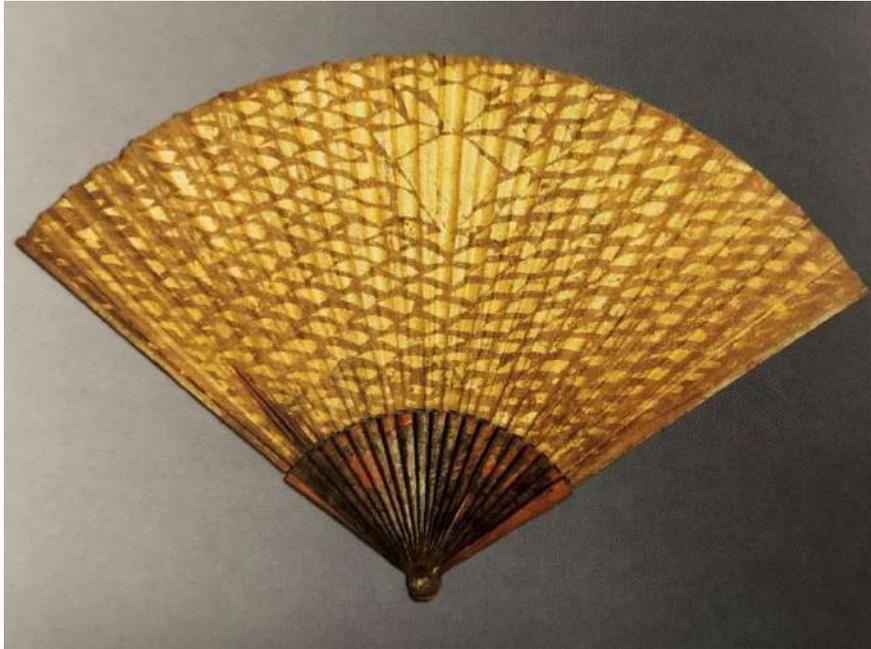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圖版頁 19（版權方：上海博物館）。

圖 8 上海朱守城墓出土漆骨灑金人物花卉扇局部



資料來源：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彩版頁 78（版權方：上海博物館）。

圖 9 上海朱守城墓出土金箋幾何紋扇



資料來源：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彩版頁 79（版權方：上海博物館）。

圖 10 上海朱守城墓出土金箋幾何紋扇



資料來源：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彩版頁 79（版權方：上海博物館）。

圖 11 圓頭黑、朱漆灑金骨黑地幾何紋金扇



資料來源：私人收藏，劉紫依 2019.1.17 拍攝，廣東廣州私宅。

圖 12 圓頭黑、朱漆灑金骨黑地幾何紋金扇扇面下沿夾層局部



資料來源：私人收藏，劉紫依 2019.1.17 拍攝，廣東廣州私宅。

附表一 明代川扇進貢、添造、停免記錄一覽

時間	事件	資料來源
永樂三年 五月壬戌	蜀王椿進荔枝等物，上賜書答曰：「……送至荔枝、艾虎、聚扇、香囊、綵花諸物，具見親厚之意。……」	《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42，頁 680。
正德六年 二月乙酉	四川巡按御史俞鑑(縉)言：「蜀盜充斥，軍興費用不貲，民苦科徵。近奉駕帖采辦(辦)禽鳥、大木、密(蜜)煎、川扇之類，宜悉停免，以紓民力。」禮部請從鑑言，乃免之。	《明武宗實錄》，卷 72，頁 1581-1582；《明武宗實錄校勘記》，頁 278。
嘉靖二十 六年四月 甲午	蜀王讓栩進扇辭賞，詔嘉其誠懇，仍賜白金、龍衣，以書獎諭。	《明世宗實錄》，卷 322，頁 5977。
嘉靖二十 九年四月 辛亥	蜀王承燾遣使進川扇，賜銀二百兩、紅羅衣一襲。	《明世宗實錄》，卷 359，頁 6429。
嘉靖三十 年	歲例扇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把……加造備用扇二千一百把。	[明]申時行等修，[萬曆]《大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113，頁 600。
嘉靖四十 一年四月 丙子	蜀王宣圻遣使進扇，賜白金三百兩、文綺衣三襲。	《明世宗實錄》，卷 508，頁 8373。
嘉靖四十 三年三月	四川布政司進年例川扇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把，蜀王進金錢鉸扇一千二把及篋扇六十把。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33，頁 358。
嘉靖四十 三年四月	命四川布政司仍造川扇柄小者增二百把、細巧者五百把，同年例進，不許粗重。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 33，頁 358。按「二百」疑為「三百」之誤，[萬曆]《大明會典》，卷 113，頁

		600：「又造小式細巧扇八百把。共一萬四千四百四十把。」
萬曆六年	蜀府進扇，回賜銀三百兩、大紅金線常服三襲。若係世子，改線段四表裡，銀同。差來人，賞鈔五百貫。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 33，頁 359。
萬曆七年 二月癸卯	添造四川扇柄七百。四川貢扇原有定額，是年巡撫王廷瞻奏造完，御批添造，歲以為常。	《明神宗實錄》，卷 84，頁 1773。
萬曆二十 三年二月 癸酉	禮部覆四川巡撫譚希思咨稱：「年例貢扇常數外，奉新旨添造扇柄，解到二千六百柄，謹送內府交收。」詔著為例。	《明神宗實錄》，卷 282，頁 5225。
萬曆二十 三年四月 七日	文書房傳旨：「著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明]談遷著，羅仲輝、胡明校點校，《叢林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61-62。
萬曆二十 四年二月 甲子	蜀王進扇，上命賜銀一百兩、大紅羅衣一襲，仍寫書復王。	《明神宗實錄》，卷 294，頁 5473。
萬曆二十 六年二月	蜀王進扇，上賜銀一百兩、大羅常服一襲。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 33，頁 359。
萬曆二十 八年三月 戊申	禮部題四川進扇粗糙不合式，傳旨經管官各降一級。	《明神宗實錄》，卷 345，頁 6422。
萬曆三十 三年二月 壬申	蜀王宣圻貢扇，回賜如例，仍加賜銀一百兩、大紅羅常服一襲。	《明神宗實錄》，卷 406，頁 7584。
萬曆三十 四年三月 辛未	蜀王遣使進扇，上賜王白金四百五十兩。	《明神宗實錄》，卷 419，頁 7926。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丁酉	四川巡按孔貞一言：「……賦額除正供外，歲進金扇四萬八千四百餘柄……近且歲有加添。」	《明神宗實錄》，卷 421，頁 7976。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辛丑	蜀世子奉銓奏進端陽五瑞等扇一千六百有奇，次第進收。共回賜銀四百五十兩、大紅羅常服三襲，命禮部寫書與世子。	《明神宗實錄》，卷 519，頁 9789。
萬曆四十三年二月乙巳	以蜀世子貢扇，賜銀一百兩、大紅羅裳服一襲，寫書與之。	《明神宗實錄》，卷 529，頁 9961。
萬曆四十六年二月己未	蜀王奉銓表進扇五百柄，上賜書答之，仍加賜銀一百兩、大紅羅常服一襲。	《明神宗實錄》，卷 566，頁 10660。
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壬午	蜀王貢扇，詔賜銀一百兩、大紅羅常服一襲，寫書與王。	《明神宗實錄》，卷 579，頁 10967-10968。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庚寅	四川布政司恭進上用扇柄，以粗惡不堪、樣數短少，各奪俸三月，仍命該省撫按究原委，通判李盤等贓罪以聞。	《明神宗實錄》，卷 580，頁 10974。
泰昌元年八月丙寅	蜀王奉銓奏進扇柄，詔回賜如例。	《明光宗實錄》，卷 7，頁 176-177。
天啟二年	四川貢扇准暫停免，留充軍餉。	[明]汪應蛟，《計部奏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3，頁 575。
天啟四年	扇柄准免，以後照例解進。	[明]朱燮元，《少師朱襄毅公督蜀疏草》(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6，頁 189。
天啟五年三月辛亥	免蜀中扇柄，明歲止進二萬，待地方事平，照舊解進。	《明熹宗實錄》，卷 57，頁 2601。

天啟六年 二月壬寅	命四川進年例扇柄以後折價解助大工，俟工完，仍舊進扇。	《明熹宗實錄》，卷 68，頁 3274。
崇禎三年 十月庚申	四川布政司解助陵工銀，帝命川省四年分貢扇仍折價助工。	《崇禎長編》，卷 39，頁 2362。
崇禎十五年 四月庚子朔	免四川貢扇三年。	《崇禎實錄》，卷 15，頁 428-429。
順治八年 八月己巳	諭戶部：「……今四川進貢扇柄……以後永免，著為令。」	《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59，頁 471。

附表二 明墓出土無書畫金面摺扇一覽<sup>224</sup>

出土地點	年代	隨葬 性別	數 量	扇釘	扇骨	扇面
甘肅蘭州彭澤夫婦墓 <sup>225</sup>	正德十六年 (1521)	女	8		圓頭	紙，黑地灑金
江西彭澤陶埜墓 <sup>226</sup>	嘉靖二十三年 (1544)	男	1		竹，圓頭，灑金	紙，兩面黑地飾小方形金片（黑漆油亮）
上海浦東陸深、陸楫夫婦墓 <sup>227</sup>	陸深嘉靖二十三年卒 (1544)		8		竹，圓頭，水磨	紙，黑地龍紋灑金、灑金加大小菱形塊
浙江安吉吳麟夫婦墓 <sup>228</sup>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1	銅	竹，圓頭，棕漆灑金	紙，棕地灑金幾何紋
			1	缺*	竹，圓	灑金幾何紋*

<sup>224</sup> 僅收錄有明確出土記錄的明代無書畫金扇，公私所藏之同類摺扇若出土來源不明則不收；主要根據已發表的文字介紹、研究整理，結合已公佈的照片、展覽實物增補或修訂之條目右上角標「\*」；不確定者加「？」，不明者闕；需另說明者附註；同墓若有他種摺扇出土，於括號內說明，以資參考。

<sup>225</sup> 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蘭州上西園明彭澤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1957），頁48；王干一，〈彭澤〉，《蘭州學刊》，3（1984），頁97。

<sup>226</sup> 丁茂松，〈彭澤清理一座明監察御史墓〉，《江西文物》，1（1990），頁119；彭澤縣博物館，〈明描金菱格紋紙面竹骨摺扇 155〉：[www.pzxbwg.com/Web/Show?Id=df3ae1aa-b020-4fc0-8a99-6229eddbd6ac](http://www.pzxbwg.com/Web/Show?Id=df3ae1aa-b020-4fc0-8a99-6229eddbd6ac)，擷取日期：2020.6.12。

<sup>227</sup> 上海博物館，〈上海浦東明陸氏墓記述〉，《考古》，6（1985），頁544。

<sup>228</sup> 周意群、秦豐、王立敏，〈安吉明代吳麟夫婦墓〉，《東方博物》，2（2014），頁44-45；安吉博物館，〈明灑金摺扇〉：[www.anjieco-museum.com/SiteWeb/Article.aspx?id=112](http://www.anjieco-museum.com/SiteWeb/Article.aspx?id=112)，擷取日期：2020.3.14。

					頭，灑金*	
			1	缺*	竹，圓頭，灑金*	灑金幾何紋*
江蘇揚州盛儀夫婦墓 <sup>229</sup>	嘉靖三十三年 (1554)	女 (另 1 把銀面無書畫)	1		桃絲竹，橢圓頭	紙，黑地灑金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釗夫婦墓 <sup>230</sup>	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女 (李氏)	1	銀	竹，圓頭*，灑金*	綿紙，黃錦滾邊，一面中心圓形描金畫，似月裡嫦娥，外圍幾何紋*，一面僅泥金祥雲紋
					(製作和彩繪技藝較朱棺所出扇粗糙)	
	萬曆十年 (1582)	女 (孫氏)	1	金	竹，圓頭*，通體塗金，主骨透雕丹鳳朝陽圖	綿紙，黃錦滾邊，黑地描金雲龍紋
1					金	竹，圓頭*，通體塗

<sup>229</sup> 吳煒，〈關於揚州城郊明墓的幾個問題〉，《東南文化》，增刊 1 (2001)，頁 47-49；馬庭順，〈揮灑聚散見乾坤——揚州博物館藏摺扇賞析(上)〉，《收藏家》，9 (2000)，頁 48-49。

<sup>230</sup> 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137、140、145、彩版頁 60、62。

					金，主骨透雕龍戲珠紋	
	萬曆三十一年 (1603)	男	1	金	竹，圓頭*，通體塗金，主骨透雕單龍戲珠、上端內側一面墨書「價廿五」	綿紙，黃錦滾邊，兩面黑地描金彩繪祥雲、五爪龍紋
湖北蕪春明永新王朱厚燾夫婦墓 <sup>231</sup>	嘉靖三十七年 (1558)		1		圓頭*，髹漆*	幾何紋金飾*
上海寶山朱守城家族墓 <sup>232</sup>	萬曆二年 (1574) 以前	男(另書畫扇若干)	1/2? <sup>234</sup>		圓頭*，黑漆上泥金小楷，落款「吳	紙，貼金幾何紋

<sup>231</sup>揚之水，〈【物色】摺疊扇底一捻風〉：

<https://mp.weixin.qq.com/s/hAVXJFvc8KvJje0RQOrbPw>，擷取日期：2021.4.22。其中有揚之水於湖北蕪春縣博物館所拍照片。

<sup>232</sup>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文物》，5（1992），頁62-63；何繼英，〈上海明墓出土摺扇〉，《上海文博論叢》，1（2003），頁34-37；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126-127、彩版頁78-79；上海博物館編，《春風千里：江南文化藝術展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頁227；朱守城墓當為家族墓而非夫婦墓的性質、朱守城卒年考訂，見劉芝華，〈物質與身份——以朱守城墓出土的文房用具為例〉，《美術學報》，3（2018），頁5。

<sup>234</sup>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頁63稱「兩幅」，頁68稱「1把」；〈上海明墓出土摺扇〉，頁36作「兩把」；《上海明墓》未言數量。

		233			舜卿真 金巧 扇」	
			1	銀	竹，圓 頭，黃 褐色灑 金（細 薄而勁 挺）	雙面棉筋紙，染 黃褐色，灑金、 貼金幾何紋
					(精巧輕便)	
			已公 佈照 片者 皆金 屬*	已公佈 照片者 皆圓頭 *，黑/朱 紅漆， 灑金/描 金畫人 物、花 鳥	紙，貼金幾何紋	
		女（王 氏） （另楊 氏棺 8 把， 殘，不 知有無 書畫）	1		圓頭*， 朱漆， 描金畫 花鳥	紙，灑金不規則 幾何紋
			1			紙，貼金不規則 圓點紋
江蘇無錫華	萬曆三年 (1575)	女	1		竹，朱 漆灑金	腐朽

<sup>233</sup>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頁 62、〈上海明墓出土摺扇〉，頁 35 稱共出土 23 把摺扇，其中書畫扇 4 把；《上海明墓》，頁 126-127 稱共 25 把，書畫扇出自男棺但未言數量。

復誠夫婦墓 <sup>235</sup>			1		竹，烏漆灑金，殘存紅袍人物畫象	
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員夫婦墓 <sup>236</sup>	萬曆十年 (1582)	女	1		圓頭，灑金*	紙，泥金，墨線繪幾何紋
廣東大埔黃宸夫婦墓 <sup>237</sup>	萬曆十年 (1582)		1	銅	竹，圓頭*，黑漆地上彩繪，一面有泥金書法*	泥金上刻網狀棧格紋
蘇州虎丘王錫爵夫婦墓 <sup>238</sup>	萬曆二十六年 (1598)	女(男棺1把書畫扇)	2	金屬*	竹，圓頭，烏漆兩金	黑底灑金加大小菱形塊金圖案
江西廣昌吳念虛夫婦墓 <sup>239</sup>	萬曆三十八年		2		楠木	紙，燙金，以墨線勾斜交叉格，

<sup>235</sup> 無錫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無錫明華復誠夫婦墓發掘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第2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138、141。

<sup>236</sup> 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頁128-129、彩版頁84。

<sup>237</sup> 林業強編，《廣東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廣州：廣東省博物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9），頁120；陳曦，〈出入君懷袖 咫尺藏乾坤——廣東省博物館藏明代摺扇（扇面）賞析〉，《文物鑒定與鑒賞》，7（2016），頁22；該扇扇面泥金刻劃工藝，見吳雪杉，〈金扇：明代墓葬與中日交流〉，《文藝研究》，12（2019），頁139。

<sup>238</sup> 蘇州市博物館，〈蘇州虎丘王錫爵墓清理記略〉，《文物》，3（1975），頁53-54；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241。

<sup>239</sup> 江西廣昌縣博物館，〈明代布政使吳念虛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2（1993），頁78、80-81。

	(1610) 、四十二 年 (1614)					僅 1 把存
江蘇無錫華 師伊夫婦墓 <sup>240</sup>	萬曆四十 七年 (1619)		1	金	竹，圓 頭，水 磨灑 金，主 骨透雕 花草	紙，灑金，均殘
			6		竹	
上海松江諸 純臣夫婦墓 <sup>241</sup>	天啟四年 (1624)	女(男 棺 3 把 書畫 扇)	1	金屬 *	竹，圓 頭*，黑 漆灑金	紙，柿漆貼金， 上繪黑線幾何形 圖案，無題款
江蘇太倉黃 元會夫婦墓 <sup>242</sup>	崇禎六年 (1633) ? <sup>243</sup>	女(男 棺 1 把 面朽不 知有無 書畫)	1		木/斑 竹? <sup>244</sup> 圓頭*， 灑金*	紙，燙金，墨線 勾斜交叉格，無 字畫
江蘇江陰長	出土收糧 簿封面寫		1		竹，圓 頭	絲綿紙(棉筋 紙)，塗柿汁，

<sup>240</sup> 無錫市博物館、無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無錫縣明華師伊夫婦墓〉，《文物》，7 (1989)，頁 48、52-53、56-58。

<sup>241</sup>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簡報〉，《考古》，11 (1963)，頁 620-622、9；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頁 134-136、彩版頁 88；上海博物館編，《千文萬華：中國歷代漆器藝術》(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頁 21。

<sup>242</sup> 蘇州博物館等，〈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考古》，3 (1987)，頁 250-251；太倉博物館編，《太倉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80-181。

<sup>243</sup> 蘇州博物館等，〈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頁 250 錄崇禎十二年地券板稱黃妻「歿於崇禎癸亥」，按崇禎無癸亥，疑為癸酉即崇禎六年。

<sup>244</sup> 蘇州博物館等，〈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頁 251 作「木質」；《太倉文物精華》，頁 181 作「斑竹質地」。

涇明墓 <sup>245</sup>	「正德十年」 (1515)					棕地灑金，內襯 剪紙
湖南郴州李家壩明墓 <sup>246</sup>	出土嘉靖七年 (1528) 刻本	(另1把灑銀無書畫)	1	金屬*	竹，圓頭*	紙，一面金粉幾何紋，一面隨意灑金
上海顧從禮家族墓 <sup>247</sup>	嘉靖以降	女(顧東川夫人)	2		1把扇骨上留有漆畫	灑金? <sup>248</sup>
		(顧從禮夫婦)	1	金屬*	竹，圓頭*，黑漆灑金	灑金*
		女(陸孺人)	1	金屬*	竹，圓頭*，灑金*	幾何紋金飾*
上海市李惠利中學明代墓群 <sup>249</sup>	明中晚期	女(男棺1把缺面不知有無書畫)	1		竹，灑金	殘，灑金
			1		竹，灑金	殘

<sup>245</sup> 江陰縣文化館，〈江蘇省江陰縣出土的明代剪紙藝術摺扇〉，《文物》，3(1979)，頁95；江陰博物館編著，《江陰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240。

<sup>246</sup> 羅勝強、段堅，〈湖南郴州李家壩明墓〉，《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4)，頁106-108、111、29。

<sup>247</sup> 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頁61-65、彩版頁31；上海博物館編，《千文萬華》，頁21。

<sup>248</sup> 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頁63稱二扇為「灑金摺扇」，未詳扇骨或扇面灑金。

<sup>249</sup> 何民華，〈上海市李惠利中學明代墓群發掘簡報〉，《東南文化》，6(1999)，頁57、62；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頁162、164。

上海永郡孫氏孺人墓 <sup>250</sup>	明	女	1		圓頭*	幾何紋金飾*
安徽臨泉姜寨明墓 <sup>251</sup>	明		1	金屬*	竹，圓頭，燙金斑，主骨上有雕刻	紙，灑金「田」字形圖案
湖南岳陽五里牌 721 工地明墓 <sup>252</sup>	明		1		竹，圓頭*，灑金*	泥金幾何紋
四川樂山市中區長征製藥廠工地明墓 <sup>253</sup>	明		1	金屬*	竹*，圓頭*，棕漆灑金*	綿紙*，棕地灑金、貼金，一面墨繪人物紋，一面幾何紋*

<sup>250</sup> 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頁 158-159、彩版頁 107。

<sup>251</sup> 阜陽市博物館，〈明代灑金紙扇〉：<http://www.fymuseum.com/detail-110.html>，擷取日期：2020.3.14。

<sup>252</sup> 湖南省博物館，〈明泥金摺扇〉：61.187.53.122/collection.aspx?id=2418&lang=zh-CN，擷取日期：2020.3.14。

<sup>253</sup> 該扇現藏樂山博物館，經筆者觀察。戴德源，〈川扇史話〉，頁 92 稱之為「絲面川扇」、「書道畫工」，描述不確，蓋僅依出土地點而非實物特徵稱之為川扇。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朱熹集撰，王華寶整理，《詩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于慎行，《穀城山館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卞榮，《卞郎中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35，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六年（1480）吳縉刻本影印。
- 〔明〕文震亨原著，陳植校注，《長物志校注》，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收入黃德寬、諸偉奇主編，《方以智全書》，冊 7，合肥：黃山書社，2018。
- 〔明〕方以智，《流寓草》，收入黃德寬、諸偉奇主編，《方以智全書》，冊 9，合肥：

- 黃山書社，2018。
- 〔明〕方以智，《通雅》，收入黃德寬、諸偉奇主編，《方以智全書》，冊 5、6，合肥：黃山書社，2018。
- 〔明〕方鳳，《改亭續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社科院文學所藏明崇禎十七年（1644）方士驤刻本影印。
- 〔明〕王士性撰，呂景琳點校，《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萬曆三十年（1602）松江府刻本影印。
- 〔明〕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輯 3 冊 67，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萬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612-1617）家刻本影印。
- 〔明〕王家屏，《王文端公尺牘》，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輯 3 冊 67，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萬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612-1617）家刻本影印。
- 〔明〕申時行等修，〔萬曆〕《大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明〕朱申鉉，《懷園睿製集》，收入胡開全主編，《明蜀王文集五種》，冊 2，成都：巴蜀書社，2018，據紅葉山文庫藏明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影印。
- 〔明〕朱孟震，《朱秉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 57，濟南：齊魯書社，2001，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朱勤美，《王國典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8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周府刻天啟增修本影印。
- 〔明〕朱燮元，《少師朱襄毅公督蜀疏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65，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人龍等刻本影印。
- 〔明〕朱讓栩，《長春競辰稿》，收入胡開全主編，《明蜀王文集五種》，冊 4，成都：巴蜀書社，2018，據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蜀藩刻本影印。
-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何偉然輯，《四六霞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223，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藏明胡正言十竹齋刻本影印。
- 〔明〕何喬遠，《閩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07，濟南：齊魯書社，

- 1996，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佚名輯，《四川地方司法檔案》，收入楊一凡、徐立志主編，《歷代判例判牘》，冊 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明〕吳之皞、〔明〕杜應芳纂修，〔萬曆四十七年〕《四川總志》，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冊 356-357，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刻本影印。
-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譯注》，潘吉星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明〕宋應星，《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明〕李化龍，《平播全書》，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校點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8。
- 〔明〕李濂，《嵩渚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71，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杜應芳、〔明〕胡承詔輯，《補續全蜀藝文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6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汪珂玉，《珊瑚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汪應蛟，《計部奏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4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邢侗著，宮曉衛、修廣利點校，《邢侗集》，濟南：齊魯書社，2017。
- 〔明〕林堯俞等纂修，〔明〕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金木散人編，李落、苗壯校點，《鼓掌絕塵》，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 〔明〕俞安期，《蓼蓼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43，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俞安期等編，《啟雋類函》，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350，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姚希孟，《棘門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78，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閔全集本影印。
- 〔明〕姜埰著，印曉峰點校，《敬亭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明〕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58，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倪繼宗清暉樓刻本影印。
- 〔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74，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1638）吳一璘刻本影印。
- 〔明〕孫繼芳，《磯園稗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1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民國十五年（1926）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秘笈影印抄本影印。
- 〔明〕徐溥等奉敕撰，〔明〕李東陽等重修，〔正德〕《大明會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1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祝允明，《枝山文集》，天津：天津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元和祝氏刻本。
- 〔明〕高濂，《遵生八箋》，王大淳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明〕張大復撰，李子綦點校，《梅花草堂筆談》，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 〔明〕張岱撰，馬興榮點校，《陶庵夢憶》，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明〕張瀚撰，盛冬鈴點校，《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明〕陳邦俊輯，《廣諧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252，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沈應魁刻本影印。
- 〔明〕陳侃，《使琉球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民國二十六年（1937）商務印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影印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輯 4 冊 76，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曹憲來刻本影印。
-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陸深，《儼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6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程正誼著，程朱昌、程育全編，《程正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 〔明〕黃成著，〔明〕揚明注，長北譯注，《髹飾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 〔明〕楊慎，《升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7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葉向高，《蒼霞續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2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虞懷忠、〔明〕郭棐纂修，〔萬曆九年〕《四川總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00，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雷禮，《鐔墟堂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湖南省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明〕劉士驥，《蟋蟀軒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82，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明〕劉侗、〔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明〕劉廣生修，〔明〕唐鶴徵等纂，〔萬曆〕《常州府志》，收入《江蘇歷代方志全書·常州府部》，冊 7，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劉鴻訓，《四素山房集》，收入《明別集叢刊》，輯 4 冊 87，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崇禎劉孔中刻清修本影印。
- 〔明〕樊維城、〔明〕胡震亨等纂修，〔天啓〕《海鹽縣圖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08，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影印。
- 〔明〕蔡獻臣撰，廈門市圖書館校注，《清白堂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
-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2001。
- 〔明〕嚴嵩，《鈐山堂集》，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輯 2 冊 11，合肥：黃山書社，2016，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蘭陵笑笑生著，戴鴻森校點，《金瓶梅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 〔明〕顧鼎臣著，蔡斌點校，《顧鼎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清〕不著撰人，《明實錄附錄·崇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清〕汪楫輯，《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故宮小紅綾本影印。
- 〔清〕文康修，〔清〕廖朝翼纂，〔同治〕《榮昌縣志》，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冊 165，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據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影印。
- 〔清〕方象瑛，《健松齋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41，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1701）續刻本影印。
- 〔清〕王士禎撰，宮曉衛點校，《香祖筆記》，收入《王士禎全集》，冊 6，濟南：齊魯書社，2007。
- 〔清〕王士禎撰，郭香圃點校，《隴蜀餘聞》，收入《王士禎全集》，冊 5，濟南：齊魯書社，2007。
- 〔清〕王元弼修，〔清〕黃佳色纂，〔康熙〕《零陵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冊 4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影印。
- 〔清〕王廷鼎，《杖扇新錄》，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生活與博物叢書·器物珍玩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清〕王培荀著，魏堯西點校，《聽雨樓隨筆》，成都：巴蜀書社，1987。
-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朱彝尊，《騰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清〕吳省欽，《白華前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清〕吳懋謙，《苧菴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07，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三年（1656）梅花書屋刻本影印。
- 〔清〕沈季友編，《樵李詩繫》，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阮葵生撰，李保民點校，《茶餘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清〕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清〕張廷玉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張貞，《杞田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7 冊 2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岑閣刻本影印。
- 〔清〕許元基纂修，〔乾隆〕《榮昌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21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二十九年（1764）增刻本影印。
- 〔清〕黃中堅，《蓄齋二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8 冊 2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清乾隆三十年（1765）黃雲惠等刻本影印。
- 〔清〕黃之雋，《唐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71，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陝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影印。
- 〔清〕葛晨纂修，〔乾隆〕《涇陽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冊 7，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據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影印。
- 〔清〕潘江輯，彭君華主編，《龍眠風雅全編》，合肥：黃山書社，2013。
- 〔清〕談遷著，羅仲輝、胡明校點校，《棗林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 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雍正〕《浙江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1。
-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 趙爾巽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撰人不詳，《天水冰山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纂，《中宗實錄》，收入該會編纂，《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

## 二、近人論著

- 丁茂松，〈彭澤清理一座明監察御史墓〉，《江西文物》，1（1990），頁 119。
-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潘瑋琳譯，《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簡報〉，《考古》，11（1963），頁 620-622、9-10。
-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文物》，5（1992），頁 61-68。
- 上海博物館，〈上海浦東明陸氏墓記述〉，《考古》，6（1985），頁 540-549、582-584。
- 上海博物館編，《千文萬華：中國歷代漆器藝術》，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
- 上海博物館編，《春風千里：江南文化藝術展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
- 中村清兄，《扇と扇繪》，京都：河原書店，1969。
- 太倉博物館編，《太倉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牛漢平編著，《明代政區沿革綜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7。
- 王干一，〈彭澤〉，《蘭州學刊》，3（1984），頁 94-98。
- 王守稼，〈漫話摺扇與中日文化交流〉，《文物》，7（1982），頁 86-88。
- 王頌，〈摺迭扇的輸入與仿製〉，《東南文化》，9（2001），頁 62-68。
- 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蘭州上西園明彭澤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1957），頁 46-49、18-21。
- 白維國，〈《金瓶梅》與摺疊扇〉，《中國文化研究》，4（1997），頁 115-117。
- 石守謙，〈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流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9（2010），頁 1-66、269。
- 安藝舟，〈明代的內市與燈市〉，《歷史教學》，10（2015），頁 39-45、72。
- 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江西廣昌縣博物館，〈明代布政使吳念虛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2（1993），頁 77-82。
- 江陰博物館編著，《江陰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江陰縣文化館，〈江蘇省江陰縣出土的明代剪紙藝術摺扇〉，《文物》，3（1979），頁 95。
- 何民華，〈上海市李惠利中學明代墓群發掘簡報〉，《東南文化》，6（1999），頁 56-62、129-131。
- 何繼英，〈上海明墓出土摺扇〉，《上海文博論叢》，1（2003），頁 34-37。
- 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吳雪杉，〈金扇：明代墓葬與中日交流〉，《文藝研究》，12（2019），頁 135-146。
- 吳煒，〈關於揚州城郊明墓的幾個問題〉，《東南文化》，增刊 1（2001），頁 47-55。
- 呂晶淼，〈十～十六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扇の流通と伝播〉，收入中島樂章、伊藤幸司編，《寧波と博多》，東京：汲古書院，2013，頁 135-168。
- 宋立傑，〈明代蜀王角色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5。
- 宋立傑，〈微妙的平衡：論蜀獻王朱椿與明成祖的關係〉，《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6（2016），頁 105-111。
-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
- 李俊傑，〈摺扇及其扇面藝術〉，《上海博物館集刊》，4（1987），頁 101-110。
- 沈從文，《扇子史話》，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5。
- 周意群、秦豐、王立敏，〈安吉明代吳麟夫婦墓〉，《東方博物》，2（2014），頁 35-50、2、4、129。
- 林業強編，《廣東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廣州：廣東省博物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9。
- 金馬，〈四川扇子與朝鮮摺扇〉，《文史雜誌》，1（1998），頁 3-5。
-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洞庭山發掘清理明許裕甫墓〉，《文物》，3（1977），頁 78-79。
- 南炳文、湯綱，《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南訪，〈明代大摺扇〉，《文物》，8（1979），頁 82。
- 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高昕丹、陳恒譯，《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 柯律格著，黃曉鵬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 范金民，〈「蘇樣」、「蘇意」：明清蘇州領潮流〉，《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

- 會科學版)》，4 (2013)，頁 123-141、160。
- 夏寒，〈試論江南明墓出土之模型明器〉，《江漢考古》，2 (2010)，頁 95-102。
- 夏寒，〈試論江南明墓出土摺扇〉，《中原文物》，2 (2008)，頁 75-81。
- 馬庭順，〈揮灑聚散見乾坤——揚州博物館藏摺扇賞析(上)〉，《收藏家》，9 (2000)，頁 48-53。
- 常建華，〈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史學集刊》，3 (2014)，頁 95-110。
- 張仁璽、馮昌琳，〈明代土貢考略〉，《學術論壇》，3 (2003)，頁 99-102。
-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圖書，1992。
- 許文美，〈明清摺扇藝術的發展〉，收入許文美主編，《惠風和暢：摺扇集萃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140-155。
- 陳旭，〈「化龍」遇「臥龍」：程正誼與明萬曆朝的平播戰爭〉，《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 (2017)，頁 159-166。
- 陳曦，〈出入君懷袖 咫尺藏乾坤——廣東省博物館藏明代摺扇(扇面)賞析〉，《文物鑒定與鑒賞》，7 (2016)，頁 20-27。
- 喬迅 (Jonathan Hay) 著，劉芝華、方慧譯，《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 無錫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無錫明華復誠夫婦墓發掘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輯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 137-141。
- 無錫市博物館、無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無錫縣明華師伊夫婦墓〉，《文物》，7 (1989)，頁 48-59、97。
- 華夫，〈扇、便面、團扇、羽扇、宮扇及其他——兼以「桃花扇」之爭謹致蔣星煜、嚴中諸先生〉，《濟南職業學院學報》，5 (2007)，頁 81-83。
- 黃阿明，〈明代貨幣與貨幣流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
- 楊可龍，〈「榮昌摺扇」技藝及其保護的初步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14。
- 楊祥民，〈扇子的故事：傳統造物的禮儀性與審美性蠡測〉，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博士論文，2011。
- 劉明杉，〈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中日交流史中的摺疊紙扇〉，《南方文物》，4 (2017)，頁 172-173。

- 劉芝華，〈物質與身份——以朱守城墓出土的文房用具為例〉，《美術學報》，3（2018），頁 5-11。
- 劉芝華，〈非書畫吳扇的源起及性別建構——基於明代墓葬出土非書畫摺扇的分析〉，收入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輯 14，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2，頁 499-524。
- 劉銘，〈從林沖的「摺疊紙西川扇子」看《水滸傳》的成書年代〉，《明清小說研究》，4（2009），頁 140-147。
- 劉曉東，〈「晚明」與晚明史研究〉，《學術研究》，7（2014），頁 98-103、160。
- 潘群，〈明代的摺扇〉，《文物》，7（1979），頁 87-89。
- 鄭麗虹，〈明代中晚期「蘇式」工藝美術研究〉，蘇州：蘇州大學設計藝術學博士論文，2008。
- 賴悅，〈清代移民與四川經濟文化的變遷〉，《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00），頁 147-153。
- 戴德源，〈川扇史話〉，《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82），頁 90-93。
- 謝盛、謝貴安，〈明代經筵講官與皇帝的特殊師生關係考論〉，《華中國學》，7：2（2016），頁 163-185。
- 謝貴安，〈明世宗經筵日講階段性特徵述論〉，《華中國學》，1（2016），頁 107-118。
- 羅勝強、段堅，〈湖南郴州李家壩明墓〉，《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4），頁 105-111、29-30。
-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冊 7，《元、明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 蘇州市博物館，〈蘇州虎丘王錫爵墓清理記略〉，《文物》，3（1975），頁 51-56。
- 蘇州博物館等，〈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考古》，3（1987），頁 250-252。
- 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安吉博物館，〈明灑金摺扇〉：[www.anjico-museum.com/SiteWeb/Article.aspx?id=112](http://www.anjico-museum.com/SiteWeb/Article.aspx?id=112)，擷取日期：2020/3/14。
- 阜陽市博物館，〈明代灑金紙扇〉：<http://www.fymuseum.com/detail-110.html>，擷取日期：2020.3.14。
- 彭澤縣博物館，〈明描金菱格紋紙面竹骨摺扇 155〉：[www.pzxbwg.com/Web/Show?Id=df3ae1aa-b020-4fc0-8a99-6229eddbd6ac](http://www.pzxbwg.com/Web/Show?Id=df3ae1aa-b020-4fc0-8a99-6229eddbd6ac)，擷取

日期：2020.6.12。

揚之水，〈【物色】摺疊扇底一捻風〉：

<https://mp.weixin.qq.com/s/hAVXJFvc8KvJje0RQOrbPw>，擷取日期：

2021.4.22。

湖南省博物館，〈明泥金摺扇〉：[61.187.53.122/collection.aspx?id=2418&lang=zh-CN](http://61.187.53.122/collection.aspx?id=2418&lang=zh-CN)，擷

取日期：2020.3.14。

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569](https://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569)，擷取日

期：2021.4.14。

## Tribute and Trend: A Study on Sichuan Folding Fans

Liu, Zi-yi \*

The unprecedented prevalence of folding fans marked one of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social customs in the Ming dynasty. Folding fans made in Suzhou and Sichuan were the most famous ones in the late Ming. Suzhou folding fans were renowned for fan leaves decorated wit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for delicate fan frames, while Sichuan folding fans were famous as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The latter were usually abbreviated as “Chuan fans” or “Shu fans” in Ming sources. In a broad sense, Chuan fans also included folding fans in the Sichuan style made in other places in the late Ming. The history, features and culture of Chuan fans have not been fully examined for two reasons. First, past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literati fa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the fan-making craft in Jiangnan. And, second, Chuan fans had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court, but the tastes of Ming court has been generally disregarded by scholars as lacking in cultural depth. Drawing on texts and images, this essay sorts out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uan fans, and links them with the folding fans excavated from Ming tombs, which feature golden leaves withou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uan fans and those produced in Japan, Suzhou, Hangzhou, and Rongchang, and considers the broader place of Chuan fa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lding fans. Furthermore,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Chuan fans in the Ming dynasty as local specialties, tributes, bestowals, gifts, commodities and so on. Chuan fans generally appeared in the early Ming, and then became tribute goods as well as trendy items.

---

\* M.A.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Representing luxury folding fans that did not have painting or calligraphy, Chuan fans were no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t-adorned Suzhou folding fans, indicating the rich diversity of Ming folding fan culture. Chuan fans also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folding fans. By the late Ming, Chuan fans had already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many aspects of Ming society. As the Ming dynasty fell, Chuan fans also declined, thus remaining of the unique elements of Ming material culture.

**Keywords:** Ming dynasty, Chuan fan, folding fan, local tribute, Ming tomb